

綠鴨朱鷺千萬里——明清時期安南、朝鮮

赴華使節的文化交流與競爭*

羅樂然**

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摘 要

本文將回顧明清時期安南使節赴華使行的過程，探討安南與朝鮮使節於中國的接觸，如何通過文學、禮儀、名分等與朝鮮使節進行文化交流與競爭。本文將聚焦於 1795 年代表西山朝出使的阮倬 (1761-1805) 之燕行詩集《華程消遣集》，分析他與朝鮮使節的唱和，指出阮倬不只單純地進行漢文學交流，亦是借朝鮮的文化地位，來肯定西山朝的文化水平；而朝鮮使節與安南使節交涉中不失禮節的形象，亦有其文化考量。

本文強調東亞使節詩文書寫的形成，並非單純的情感交流或互相欣賞，同時也充斥著各種文化較量的意涵，是文化競爭的結果。相關成果將有助於學界思考文化競爭意識如何作為東亞世界秩序維繫的因素，以及朝貢國自我呈現的手段。

關鍵詞：安南燕行，朝鮮燕行，文化競爭意識，西山朝，阮倬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8 年 6 月 9 日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舉辦的「東亞漢文境外行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後經多次刪改。審查期間，特別鳴謝香港大學黎河秋鶯同學協助閱讀越南文獻。此外，感謝《清華學報》編委會與審查人提供豐富意見，也感謝許怡齡、阮黃燕、劉玉璿諸教授邀請出席 2021 年 5 月 21 日的閉門工作坊「2021 年越南朝鮮使節燕行錄論壇」。與會期間，獲得王思翔教授的精闢意見，使文章得以進一步完善。當然，文責自負。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lylaw@hkmu.edu.hk

一、引言

東亞使節的交流活動是近現代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課題，¹ 東亞研究的視野極重視東亞世界的文化結構，以及地區性的在地文化因素。中國自古以來形成的禮儀，也逐漸規範建構了東亞秩序，可從漢字、儒教、律令及佛教四個共同文化指標來說明東亞文化的特徵。² 數百年來中原歷朝與周邊國家，如安南、朝鮮等有更緊密的互動後，中國文化成為這些地區建立文明的指標。

東亞各國在歷史的變化過程中，上述的文化指標在東亞世界不同的場景與語境下，構成更多交流活動與文化現象。如日本的遣唐使、百濟的五經博士科、安南吳朝 (939-965) 的佛教與道教的接受及其在地化等，都看到東亞世界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名詞，也不只是一個探討中國文化對周邊影響的文明圈，而是像子安宣邦所說的：「以大陸中國為中心的文明圈之內，中國之外的個別地區、國家都可以從他們各自的立足點對這個文明提出新的學術觀點。『東亞』文明就是這樣一種新的文明論，或者是文化史的概念。」³ 本文採取子安宣邦的觀點，不只觀察東亞使節如何使用漢文或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是把視野放在東亞文化脈絡，觀察東亞各國的不同觀點。

東亞世界裡最可引證相關想法的例子，便是東北亞的朝鮮與東南亞的安南。⁴ 明清時期，兩國是朝貢或宗藩體系的定期參與者；兩國社會也一直受到儒學的影響，⁵ 在制度、意識形態與統治理念上均有中華化的現象，因此兩國文化有可比

¹ 黃俊傑認為使節研究是讓此領域「範式轉移」的關鍵，其想法成為不少研究者從事東亞使節研究的框架。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頁 187-218。

²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1》，《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 4 冊（東京：岩波書店，1969），〈總說〉，頁 5。

³ 子安宣邦著，童長義譯，〈「東亞」概念與儒學〉，收入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44。

⁴ 因「越南」一詞，或有讀者容易產生歧義，亦與歷史面貌不太相稱。為免與 1804 年建立的越南或 1945 年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產生混淆，本文以古代中華帝國對該南方藩屬國的賜稱「安南」，來統稱各中南半島東岸建立的政權代表。與安南一樣，朝鮮也是中華帝國賜名的國號。本文以兩地通過清朝宗藩關係的建立而相遇的過程作為探討對象，故特別以「安南」與「朝鮮」來指稱兩地。如需特別標誌安南某一朝代或政權，則輔以政權及朝代稱號以作區別。

⁵ 朝鮮與安南都在隋唐時期開始日漸受到中原文化與儒學教育影響。像朝鮮半島的新羅國崔致遠 (857-?) 於公元九世紀入唐留學，並曾參加過當時的博學鴻儒科，在淮南一帶協助當時的節度使高

性。兩國的歷史發展亦受制於區域社會的意識、環境與形勢。子安宣邦的想法，正好有助我們切入東亞使節的研究，比較各地的立足點，觀察如何產生不同的想法。

朝鮮立國以來視明朝為宗主國，持續履行「事大以誠」的朝貢制度，⁶ 印刷書籍等文化亦受中國影響。同樣地，安南曾受明朝統治，⁷ 安南士大夫也大量印刷書籍。由於印刷文化的流行，讓更多朝鮮與安南士大夫⁸ 通過書籍記錄各種經歷，特別是他們使華的經驗、感受或體會。此可見於學者大量整理與出版漢文或非漢文的朝鮮及安南燕行錄。

自 1967 年成均館大學出版《燕行錄選集》以來，華文及東亞研究者開始對使節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到了二十一世紀，韓國東國大學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燕行錄續集》、⁹ 復旦大學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等，¹⁰ 大量學術機構翻譯與整理材料，提供更多元的學術材料以供學界研究東亞使節。其中，韓國學者對朝鮮燕行錄研究的反思、¹¹ 日本學者夫馬進的燕行錄研究、¹² 葛兆光一系

駢 (821-887) 任職從事官，並以高水平的文筆撰寫《檄黃巢書》。及後，元代時後周人雙冀把朱子學說傳入朝鮮半島，1392 年立國的朝鮮以此作為國家管治的思想來源，儒學便主導了朝鮮半島的社會與文化。John Duncan,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Koryō and Early Chosōn," *Korean Studies*, 18 (1994), pp. 76-102. 另一方面，早於唐天寶年間 (742-756)，已有安南一帶士人成功考進唐朝的進士科與明經科，理學在李朝（即十一至十三世紀）隨著與宋朝的接觸，也在安南一帶開始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安南也自李朝以後開始按照儒學知識的標準舉行科舉開科取士。此例也具體證明了安南社會如何在李朝以後日漸儒學化。詳參陳文，《越南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29-36。

⁶ 關於朝鮮立國初期「事大國策」的落實，詳參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教育圖書，2009）。

⁷ 鄭永常，《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出版組，1998）。

⁸ 朝鮮方面的出版文化，可參考 Ok Young Jung, "The Publishing Entities of Korean Traditional Prints," in *Early Printings in Korea* (Seongnam: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Press, 2013), pp. 85-103. 安南方面，十五世紀曾代表後黎朝出使明朝的梁如鵠 (1420-1501)，在中國學習各種刻書技術後，將刻書文化傳回後黎。自此，安南的出版有長足的發展。劉玉琚，《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96-101。

⁹ 共出 100 冊，後來續集再出 50 冊。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燕行錄續集》（首爾：尚書院，2008）。

¹⁰ 共出 25 冊。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¹¹ 崔韶子，〈明清과 朝鮮, 朝鮮과 明清 關係史 연구현황과 과제—수교 20 주년에 즈음하여—〉，《명칭사연구》，38（首爾：2012），頁 1-57；〈「燕行錄」연구를 위한 제언〉，《명칭사연구》，30（首爾：2008），頁 1-11。

¹² 夫馬進著作的中譯本在 2010 年出版後，啟發了很多後輩參與燕行研究，詳參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夫馬進後來才正式推出更全面的日文專書，詳參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

列周邊看中國的研究、¹³ 孫衛國的中華觀探討、¹⁴ 大陸學者對燕行錄學的倡議或是以域外漢籍為視野的研究等，¹⁵ 都反映學者對於《燕行錄》的關心。安南燕行的研究也相當豐富，特別是日本與中國不少學者都就此議題展開討論，包括燕行使節對異域的想像與其背後因素的研究。¹⁶

單國的使節研究已不足以滿足學界對東亞使節的好奇。因此，學界日漸重視東亞各國使華期間彼此的互動。以朝鮮與安南之間的交流研究為例，¹⁷ 清水太郎的一系列使行研究，可視為最早、最完整的研究成果。¹⁸ 清水太郎指出兩地使者在中國所形構的世界秩序裡，通過漢字與官話作為媒介，彼此有顯著的交流，特別是使節間的文學交流非常豐富。¹⁹ 除此之外，近年亦有一些新視角，如情報蒐集及使節之間的文化比較，讓學界對該課題有更深刻的了解。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

- ¹³ 2009 年起，葛兆光展開周邊看中國的研究，其主要思考點是在東亞世界下，如何運用新材料、新視野重探中國歷史。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觀念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 ¹⁴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¹⁵ 漆永祥，〈「燕行錄學」芻議〉，《東疆學刊》，36.3（延邊：2019），頁 1-15；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南國學術》，2（澳門：2015），頁 76-89。不過，兩位學者所引用的例子大多是朝鮮方面的，較缺少安南方面的燕行論述。
- ¹⁶ 可參考以下一些近年的中日研究，如野平宗弘，〈阮攸の北使経路の再考〉，《総合文化研究》，20（東京：2017），頁 6-26；吉川和希，〈十五世紀後半の中越間における使節往還：一四七五年ベトナム使節の雲南到来とその背景〉，《東洋学報》，97.4（東京：2016），頁 59-93；王晨光，〈朝貢與創作——越南使節燕行詩文研究意涵探析〉，收入 Robin Visser、樂鋼主編，《東亞人文·2014 年卷》（臺北：獨立作家，2014），頁 255-268。
- ¹⁷ 當今韓國與越南的學者也對這方面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與分析，像朴現圭，〈《皇越詩選》所載越南與朝鮮使臣酬唱詩〉，《域外漢籍研究集刊》，1（南京：2005），頁 292-306；Phạm Quang Ái (范光愛), "Hoan Nam sứ giả Nguyễn Đê xướng họa cùng sứ thần Triều Tiên,"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và Phát triển*, 140 (2017), pp. 67-82.
- ¹⁸ 清水太郎，〈北京における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交流——15 世紀から 18 世紀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研究》，48.3（京都：2010），頁 334-363。除此以外，他先後採用了不同的例子，像 1597 年、1790 年等具體的年分談述兩國使節之間的文化交流。清水太郎，〈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 (3)——1597 年の事例を中心に〉，《北東アジア文化研究》，16（鳥取：2002），頁 35-54；〈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 (2)——1790 年の事例を中心に〉，《北東アジア文化研究》，14（鳥取：2001），頁 31-47。
- ¹⁹ 清水太郎，〈北京における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交流——15 世紀から 18 世紀を中心に〉，頁 335。

沈玉慧探討朝鮮與安南等使節在北京停留期間，如何蒐集情報以了解各國的社會文化。她提出朝鮮與安南的使節會將各自的歷史、文化、政治等問題反映在筆談的過程中，且特別重視禮儀的問題。²⁰ 沈玉慧以李商鳳為例，談及朝鮮使節對安南使節有所鄙視，而安南為避免被視為蠻夷，往往派遣漢文素質較高的學者擔任使節，表示雙方有文化比較的意識。²¹ 李宜樺通過安南使節的書寫，探討安南燕行使在北京期間的使行活動，如探遊北京各地景、²² 參與官方的活動儀式，²³ 以及私人活動等。其中，使節也有不少機會與朝鮮使節相遇，²⁴ 因為朝鮮使節前往北京的機會遠較安南使節為多，故這種雙方接觸的機會亦非常頻繁。²⁵

本文標題「綠鴨朱鷺千萬里」，出自安南西山朝出使北京的使節阮倬（1761-1805）所撰的《華程消遣集》。阮倬，原名阮爾，是後黎晚期的重要官員阮儼（1708-1775）的第六子、²⁶ 著名阮朝文人阮攸（1766-1820）的兄長，²⁷ 也是驩州宜仙阮家第六代後人，一世祖先為莫朝（1527-1592）大正三年（1532）壬辰科庭試狀

²⁰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50（臺北：2012），頁 109-153；另參沈玉慧，〈近世東亞海域之使節交流與情報網絡——以朝鮮對暹羅、南掌、緬甸、蘇祿等國之情報蒐集活動為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6.1（臺北：2016），頁 27-59。

²¹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頁 123-125。

²² 李宜樺，《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7），頁 55-111。

²³ 同前引，頁 112-148。

²⁴ 除李宜樺的博士論文，這方面的交流研究亦可參考張京華，〈三“夷”相會——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為中心〉，《外國文學評論》，1（北京：2012），頁 4-44。

²⁵ 李宜樺，《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頁 194-233；李宜樺聚焦於安南使節，從他們與朝鮮使節之間的互動進行分析，說明兩地使節關係友好。除此以外，關於越南燕行使的研究，亦可參考阮黃燕，〈國內外未出版的越南燕行錄資料及其研究價值〉，《域外漢籍研究集刊》，13（南京：2016），頁 253-267；《1849-1877 年間越南燕行錄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英語學界的研究，可參考 Liam C. Kelley,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Envoy Poetry and 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hip*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²⁶ 阮倬是阮儼側室陳氏所生的兒子，母親陳氏因阮倬之貴，獲加贈烈夫人正一品的獨厚封號。阮儼等編纂，《驩州宜仙阮家世譜》（漢喃研究院藏，編號：Vhn.1852），頁 26b-27a。

²⁷ 阮攸是安南阮朝的著名文學家，在十九世紀時曾安排擔任如清歲貢正使，先後擔任阮朝中央與地方官員，獲得正面的評價。《大南寔錄》裡亦有其傳。張登桂等修，《大南寔錄》第 4 冊（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1962），《正編·列傳初集》，卷 20，頁 8a-12a；關於阮攸文學與出使研究，詳參野平宗弘，〈ベトナムの詩人、阮攸の 19 世紀初頭漢詩作品における屈原〉，《東京外国語大学日本研究教育年報》，19（東京：2015），頁 175-190；Liam C. Kelley,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pp. 101-109.

元阮情 (1495-1557)。²⁸ 阮情後來出任後黎朝的吏部尚書，後謀為莫朝復國，但戰敗後隱姓埋名。²⁹ 阮氏二、三世已復任後黎各級官員。³⁰ 阮倬為後黎時舉人，擔任翰林院供奉。³¹ 西山軍消滅黎朝、後黎愍帝流落清朝後，阮倬在西山光中元年 (1788) 赴任新朝官職，擔任翰林院侍書職位，³² 專門處理外交文書，也被委派擔任使節。

標題詩句中的「綠鴨」指的是朝鮮半島北面的鴨綠江，而「朱鳶」是古時河內一帶的地區行政稱謂，³³ 兩地一綠一紅、一鴨一鷹、一海一陸，形成互相媲美的詩意。兩國雖遠隔重洋，然隨著阮倬前往北京，將與千里之外的友人相會，讓他無法忘懷。阮倬描述了安南與朝鮮間一段跨海的深厚友誼，然而事實是否如此？《華程消遣集》裡所描述的朝、越唱和透露出什麼端倪？

葛兆光在一連串探討日、朝通信使的專題論文與論文中，說明當時日、朝之間的文士，以「名分」、「禮儀」、「衣冠」、「風俗」與「詩文」等進行文化間的比較，並以傳統中國古典知識、禮儀準則與藝文意識來作為競賽尺度。³⁴ 葛兆光重視「不在場」的中國，在日、朝之間如何影響著兩者的互動。黃俊傑指出，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視野應從中心移往邊緣，以中國作為各國使節重要的交涉空

²⁸ 阮儼初編輯的阮家世譜指：「按長老語錄，公世家子原貫山南青威，料族祖諱情，莫大正壬辰狀元，歸順黎朝，官至吏部尚書。」阮儼等編纂，《驩州宜仙阮家世譜》，頁 1a-1b。

²⁹ 壬辰，莫大正三年（明嘉靖十一年）：「春，莫開會試科，賜阮情，【青威耕穫人。仕至尚書舒郡公，後歸命黎朝，倦之父。】裴永，吳山快三名進士及第，阮迪康等六名進士出身，阮良弼等十八名同進士出身。」吳士連纂，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中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6），本紀卷 15，頁 840。關於陳荊和的越南史研究貢獻，詳參區顯鋒，〈陳荊和對越南史研究之貢獻〉，收入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366-386。

³⁰ 阮儼等編纂，《驩州宜仙阮家世譜》，頁 2a-4a。

³¹ 同前引，頁 42b。

³² 《世譜》中以「勉強」來形容這次赴任。同前引，頁 43a。另參 Liam C. Kelley,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pp. 104-105.

³³ 早在魏晉時期，很多漢籍文獻如《水經注》、《交州外域記》，甚或是《晉書》都已經記載交州一帶有朱鳶縣。《晉書》記載，早於漢代，已置有交州朱鳶縣，詳參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5，〈志五·地理下·交州〉，頁 465。

³⁴ 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化論叢》，2（上海：2014），頁 46-47。此外，葛兆光所屬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輯了一本論文集，邀請中、日、韓學者就通信使文獻，探討文化間比賽的觀念下，日、朝之間互動的具體意義以及尋求新視角回應東亞史。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東亞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北京：中華書局，2019）。

間，觀察東亞各地的「自我」與「他者」的互動、衝突、重塑、轉化或融合。³⁵ 朝鮮與安南的交流除了如過往學者所描述般雙向友好之外，互相仿效與追逐的文化競爭意識，是否亦為朝鮮與安南的交往模式之一呢？

經常被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借用的「接觸空間」(contact zone) 提議者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有另一套用語——「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 更為切合朝鮮與安南之間相遇的情況。普拉特探討美洲殖民的過程時，指出「自我民族誌」是被殖民者利用殖民者話語來呈現自我的渠道，並非單純真實的反映，亦即表述自我的話語中，有部分是配合或挪用征服者的說法而成的，從而使群體的觀點與聲音進入宗主國的文本文化 (metropolitan lettered culture)。³⁶ 雖然中國朝貢體系與美洲殖民不能相提並論，但普拉特提出的「被殖民者」話語涉及宗主文化構成，與朝鮮和安南在相遇時，以中國文化與典章制度作為話語，進行酬唱與互動以呈現自我身分，有相近的地方。故本文將進一步利用「自我民族誌」分析朝鮮與安南使節相遇時所形成的文化競賽意識，如何成為建構自我表述的重要部分。

文化相遇是一組研究自我與他者之間接觸、相遇、妥協與溝通的論述，鐘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以其研究十七世紀中歐文化相遇的經驗，指出文化相遇是傳播者與接受者之間的互動，兩者的角色是可互換的。³⁷ 這種互動可作為理解跨文化情境具體的實際狀況，交往互動的過程中，多元的觀點交錯。這種交織並非單純自我對他者的建構，而是自我與他者在文化交錯間形成的跨文化文本。本文將借鑑鐘鳴旦的跨文化相遇互動溝通框架，³⁸ 進一步利用普拉特所提出的「自我民族誌」，分析十六至十八世紀間東亞世界多場朝鮮與安南間的交流場景，安南與朝鮮如何在「接受者」與「傳播者」之間不斷互換角色，呈現「文化競賽」的考量與他者較勁的尺度與標準，從而探討文化競賽觀念如何成為形塑兩地接觸與互動的溝通

³⁵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頁 196。

³⁶ 普拉特指印加歷史學者波馬 (Guaman Poma) 撰寫印加王國編年史時，也利用了西班牙的編年史與圖述方法呈現自身的歷史。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9.

³⁷ 鐘鳴旦提出四組跨文化接觸的交流框架，分別是傳播框架 (Transmission Framework)、接受框架 (Reception Framework)、創新框架 (Invention Framework) 和互動溝通框架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Framework)。前三者均是過去受學界爭議的視野，而第四個框架則是鐘鳴旦倡議的想法，就是文化相遇的傳播過程具有互動性。Nicolas Standaert,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 (Hong Kong: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pp. 4-27.

³⁸ 陳慧宏曾就其理論深入探討，詳參陳慧宏，〈「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臺大歷史學報》，40 (臺北：2007)，頁 239-278。

方式。其中，以 1795 年代表安南西山朝阮侁的《華程消遣集》與朝鮮使節接觸的特殊案例，思考兩者之間的文化競賽觀念如何影響阮侁對自我及朝鮮的論述，從而探討文化競賽觀念與東亞政權秩序與文化認同等觀念之間的關係，為東亞文化交流史帶來新的論述方向。

二、燕京作為「接觸空間」與朝鮮、安南的赴華使行

1636 年丙子胡亂後，朝鮮被迫放棄原來對明的事大朝天使行，改事當時的後金，即清朝，為新宗主國。³⁹ 事大外交是朝鮮在十四世紀時的重要立國政策，一方面是慕華心態的投射，另一方面則是現實政治上「以小事大，保國之道」的考量。⁴⁰ 在朝鮮史料中，可發現朝鮮燕行使團禮儀的安排相當完善，從上下馬的接待到各種文件格式的預備，都極具規模且精心安排。⁴¹ 在官方的儀式之外，也有很多時間讓使節遊歷或與人交往，他們停留在北京的時間相當充足，洪大容曾說：「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游觀。……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謂東方不足憂，禁防少解。然遊觀猶托汲水行，無敢公然出入也。數十年以來，昇平已久，法令漸疎，出入者幾無間也。」⁴² 康熙末年，清廷認為天下國泰民安，故減少朝鮮使節在北京遊歷的禁令。禁令的解弛也是朝鮮燕行書寫在康熙以後變得更豐富的關鍵原因。

相對於朝鮮，安南使節的限制較多，主要因為朝鮮被視為清朝的宗藩模楷。⁴³ 清朝經常更寬待朝鮮，以清、朝關係作為清與各國宗藩關係的準則。⁴⁴ 一般從朝鮮半島的義州出發到北京，並不超過一個月。相對地，從安南到北京，出鎮南關

³⁹ 1636 年皇太極以朝鮮背棄 1627 年所定立的兄弟之盟，再次派兵進攻朝鮮半島，為了逃避戰事，當時國君朝鮮仁祖（李倧，1595-1649，r. 1623-1649）被迫逃到漢陽南面的南漢山城，但圍困數月之後，仁祖還是被迫出城，前往三田渡向皇太極投降，韓國史稱之為「丁丑下城」。自此，朝鮮不再是明朝的藩屬國，而是成為清朝的藩屬國。Wang Yuancho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⁴⁰ 范永聰，《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 vii；孫衛國，〈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天津：2002），頁 67。

⁴¹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朝鮮燕行使とは何か〉，頁 1-5。

⁴² 洪大容，《湛軒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248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外集，卷 7，〈湛軒燕記·衙門諸官〉，頁 15a。

⁴³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0.1（臺北：2013），頁 305。

⁴⁴ Wang Yuancho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pp. 50-85.

後，經河道及陸路，途經廣西、廣東、湖北、河北等地，然後到達直隸，至少須三個月。⁴⁵ 安南的朝貢次數要求亦比朝鮮少，康熙時規定安南三年一貢，後改為六年兩貢並進，⁴⁶ 到道光年間則改為四年一貢。⁴⁷ 安南的貢道為了因應中國各省的問題而改動，使安南使節對各種變動產生了好奇。⁴⁸ 朝鮮則是一年一貢，使行方式與路線大體相同。這些使行形式及次數的差異，導致兩地使節對於中國社會及赴華途中的各種遭遇，都有不同的觀察與考量。⁴⁹ 朝鮮和安南的使節們對於在北京活動的態度，也因為使行機會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想法。

張伯偉曾根據朝鮮《燕行錄》指出，朝鮮燕行使出使頻繁導致有沿襲舊說的問題：「途程相似，後來者又往往闡述以往記錄，除少數人有考證癖，或可糾正前人之謬，多數乃沿襲舊談，所以難免雷同。」⁵⁰ 張伯偉此說也可以反向操作理解：某些朝鮮使節認為燕行的經歷並沒有什麼新奇的發現，⁵¹ 但礙於朝鮮文人間的習慣，也只好以沿襲舊說的方法書寫《燕行錄》。因此，當朝鮮與安南兩國《燕行錄》相提並論時，一些朝鮮文人或許未必有興趣深刻分享這類型的燕行經歷，安南使節遇見朝鮮使節的記載內容往往較為豐富。

而且，明清易代以後，朝鮮使臣對中國的形象與感受已與先前不同。不少士大夫視使華為苦差，而不像朝天時有慕華的心態。朴齊家 (1750-1815) 曾經說過：「清興以來，國朝士大夫，以中國為恥，雖黽俛奉使，而一切事情，文書，言語之

⁴⁵ 關於貢道的具體情況，詳參賴淙誠，《清越關係研究——以貿易與邊務為探討中心 (1644-188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98-105。

⁴⁶ 「七年，安南國王差官歲貢，及奉謝恩冊封。奉謝 賜卹奉敘欵貢，各具奏疏，並乞將三年一貢之例，改為六年兩貢。奉旨允行。」勒德洪等修，《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1993，清康熙年間刻本)，卷 72，〈禮部 33·主部清吏司·朝貢通例等〉，頁 15a。

⁴⁷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再版)(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頁 246-247；慶桂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404，「乾隆五十七年五月辛丑」，頁 862。

⁴⁸ 鄭幸在為阮倬《華程消遣集》撰寫的解題裡提到，1795 年時湖南一帶發生苗民起義，故北京立刻命其繞道，使其行程增加，令他對新鮮景致產生了興趣。阮倬，《華程消遣集》，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 8 冊，頁 104-105。

⁴⁹ 陳國保，〈越南使臣對晚清中國社會的觀察與評論〉，《史學月刊》，10 (開封：2013)，頁 55-67。關於兩地使節之間的文化觀察的比較，可參考陸小燕，〈康熙十三年安南使者的中國觀感與應對——兼和朝鮮燕行文獻比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10 (南京：2014)，頁 241-260。

⁵⁰ 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頁 83。

⁵¹ 十九世紀初朝鮮燕行使節之一的金景善曾指出，燕行作紀錄者有三位最為著名，分別是：稼齋金氏(金昌業)，以編年條暢為名；湛軒洪氏(洪大容)，以沿途紀事為名；燕巖朴氏(朴趾源)，以立傳方式閱博各種知識為名。金景善認為「繼此而欲紀其行者，又何以加焉？」或許因為如此，不少使節無法突破被視為出色燕行書寫的寫作方法。金泰俊，〈연행록의 교과서 『노가재연행일기』〉，《국제한국학연구》，1 (首爾：2003)，頁 93-98。

去來，悉委之於譯。」⁵² 朴趾源 (1737-1805) 也曾說：「清興百四十餘年，我東士大夫夷中國而恥之。」⁵³ 兩位被視為最具代表性的燕行士大夫均有同樣的觀察，可見是當時士大夫的普遍傾向。「北京」對某些朝鮮人來說，日漸成為不足為奇的地方了。

安南使節出版與紀錄的文獻不及朝鮮的使行紀錄。安南的政權更迭繁多，不若朝鮮穩定，中越兩地的關係亦不能與中朝關係相提並論。明永樂年間 (1403-1424)，聯同占城 (137-1697) 推翻陳朝 (1225-1400) 的大虞胡朝 (1400-1407)，展開了明入越的戰爭（或稱明與大虞戰爭）。戰爭結束後，胡朝滅亡告終，標誌著安南屬明時期。明宣德年間 (1426-1435)，鑑於安南長年的反明叛亂與衝突，明朝最終退出安南，並冊封藍山一帶貴族黎利 (1385-1433) 為新大越國土的君主，而黎利亦在國內自稱大越皇帝，一般史冊稱之為後黎朝，黎利政權在明清兩朝均與中國保持藩屬關係。直至十八世紀，安南國土分裂為多個政權，清朝同時需要面對各個政權，以維繫自身宗藩關係最大的利益。

北京朝廷一直承認的「安南國王」是後黎朝政權，⁵⁴ 但安南實際上被鄭家（控制後黎王朝以及安南北部）與阮家（自稱為廣南國，定都順化，管治安南中部一帶）兩大家族分治。⁵⁵ 到十八世紀末，一個短暫的農民政權西山朝興起。⁵⁶ 清朝最初只承認後黎朝的安南國王所派遣的使節，後來阮氏及西山朝也派出使節出使中國，使得朝貢意涵在安南的脈絡變得更為複雜。有別於朝鮮以朝貢彰顯國家是禮義之邦，借禮儀來辨別本國的中國性，安南各政權則更需要清朝的認可，來肯定其政權的合法性。

來自安南的「北使」，也會因所代表的國家不同，他們北往的活動也都帶著不同的政治考慮。特別是十八世紀末，在後黎、廣南國與西山等國之間的競爭過程

⁵² 朴齊家，《貞蕤集》（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北學議·內編〉，頁 413。

⁵³ 朴趾源，《燕巖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252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卷 11，〈熱河日記·行在雜錄〉，頁 45b。

⁵⁴ 自十世紀起，安南歷朝皆稱帝紀元，並於區域內塑造大越皇帝為中心的宗藩體系。與此同時，各朝國君亦同時再度向中國中央王朝稱臣，如接受安南國王等封贈爵職。為方便華文書寫與閱讀習慣，本文採用的朝代均以各大越國君稱姓來稱謂不同政權，以便讀者分別朝代。關於內帝外臣稱號，詳參葉少飛，〈越南古代「內帝外臣」政策與雙重國號的演變〉，《形象史學研究》，1（北京：2016），頁 134-166。

⁵⁵ 孫宏年用的說法是：「黎氏為王，鄭氏執政」。孫宏年，《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頁 17。

⁵⁶ George E. Dutton, *The Tây Sơn Uprising: Society and Rebell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Vietn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pp. 18-56.

中，朝貢活動亦成為他們爭取政治認可的渠道。對西山朝來說，這樣的認可更是重要。西山於 1771 年在安南南部興起，是專門針對南方廣南國阮氏政權的農民起義。由於他們出身農民，得到了不少農民的支持，很快便成功推翻廣南國的統治，亦稱為阮朝。史學界為了分辨這個短暫政權，一般稱為西山朝。不久，他們為鞏固國家並希望統一安南，征服北越鄭氏。這次行動引起清朝的介入，乾隆派出孫士毅 (1720-1796) 出征半島，⁵⁷ 但後期西山軍反擊成功，使得清軍在安南境內大敗，退回廣西。結果阮惠（後改名為阮光平，1753-1792）向清朝請和，⁵⁸ 並在翌年 (1790) 派出使團朝貢，而清朝也應許阮惠為新任安南國王。1790 年西山阮惠以安南國王身分前往北京，⁵⁹ 接受朝貢禮儀，重啟兩地之間的宗藩關係。⁶⁰

他們的使行路程較長，對使行的記載也比較多元。陳益源等學者曾專門探討使節在途中的所見所聞，⁶¹ 其中廣東是使節經常書寫的地方。⁶² 此外，安南使節赴京期間，都會與不少地方官員或文人酬唱、閒談。儘管他們並未談及深度的文化議題，但是安南使節途經中原各省市，所見所聞也頗為豐富；而朝鮮的使節則大多時間停留在權力核心的北京與滿州遺風的東北地區，貢道讓他們認識的中國面向與安南使節所見的完全不同。

朝鮮與安南派遣使節的形式雖然相近，但在出使的具體動機、使節意識以及行程上卻有很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使大家對書寫與行程的關注有所不同。當雙方在北京有互動、酬唱的機會時，就會引證各自的文化意識，這種文化意識的比較正是

⁵⁷ John E. Wills Jr. 提出朝貢不是一種已石化的象徵概念，而有其實用意義，故從後黎朝尋求清朝支援，到清廷最終派出孫士毅介入，都反映清朝重視與安南等朝貢國彼此間的朝貢關係以及國家邊土的安全。John E. Wills Jr., "Functional, Not Fossilized: Qing Tribute Relations with Đại Việt (Vietnam) and Siam (Thailand), 1700-1820," *T'oung Pao*, 98.4-5 (2012), pp. 439-478.

⁵⁸ 根據《大南寔錄》記載西山朝歷史：「黎維禔棄國而逃，天朝斷不復以安南畀之，可坎此未奉劇旨之前，委人叩關籲求，庶可仰邀恩典。惠得書，知清人欲講和，心易之。乃使其將嘯虎侯遞表，求為安南國王。」阮朝國史館編纂，《大南正編列傳初集》（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劃藏，編號：NLVNPf-0137-08），卷 30，〈偽西列傳·阮文惠〉，頁 36a。

⁵⁹ 阮惠到底是本人親身入華，還是找人假冒自己，一直有學者就其入華問題有所存疑與討論。關於阮惠朝覲問題的考證，詳參張明富，〈乾隆末安南國王阮光平入華朝覲假冒說考〉，《歷史研究》，3（北京：2010），頁 60-67。

⁶⁰ 此舉是希望借清朝來確認西山的正統與認受性，以克服安南各地對西山不滿的困境，可參考 George E. Dutton, *The Tây Sơn Uprising*, pp. 108-109; 陳國保，〈越南使臣與清代中越宗藩秩序〉，《清史研究》，2（北京：2012），頁 63-75。

⁶¹ 陳益源、凌欣欣，〈清同治年間越南使節的黃鶴樓詩文〉，《長江學術》，4（武漢：2011），頁 144-157。

⁶² 陳益源，〈清代越南使節於中國廣東的文學活動——兼為《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進行補充〉，《嶺南學報》，6（香港：2016），頁 247-275。

東亞使節研究在過去未全面探討的議題。下文將以安南使節與朝鮮使節交往過程作為切入角度，思考文化競賽的意識如何形成雙方使節的互動以及詩文的書寫方向。

三、明清時期安南與朝鮮使臣文化競賽

朝鮮與安南使節有不少酬唱活動，這些活動具有文學與文化交流的意義。詩歌是重要的交流媒介。正如王晨光所言：「明清的外交行記中，詩歌所佔的比重凸顯，詩歌特點主要為三點：其一總體上為行程歌詠之作，其二贈答酬唱之作數量逐漸增加，其三外交記行的詩歌與酬唱詩歌的界限明確區分。可以理解，這正是隨著明代之後國家疆域擴展而形成的意識投射，即對『記事』、『記文』差異的重視。」⁶³ 不過，過去安南或朝鮮使節主要的酬唱對象是華人與朝廷官員，不少學者的研究考察了詩中記載的各種賞玩或審美，少數學者則從政治專對的角度來研究這樣酬唱的活動。⁶⁴ 其實使節的書寫，無論對象是明清兩朝的官員，抑或是各地來華的使節，有意或無意間皆視酬唱為彼此文化比較與競爭的一環。

專門記載譯官或使節在明朝出使時的各種經歷的《稗官雜記》，作者魚叔權記載朝鮮譯官曹伸（1454-1529）曾與後黎朝使節黎時舉（生卒年不詳）會面的情況。清水太郎通過各種史料對比以及《海東雜錄》的記載，認為兩人確實有見過面，但也認為魚叔權所記載的交流實是虛構。⁶⁵ 然而，即使是虛構的交流內容，仍然可以反映朝鮮如何利用安南，構築了文化競賽的意識，從而呈現自我。

魚叔權記載：

曹適庵仲嘗赴燕京，與安南國使黎時舉作詩酬唱，至數十餘篇。黎詩一首云：「三韓見說景偏殊，鴨綠澄澄水色秋。知是江山詩思好，還將句法效蘇州。」適庵次云：「嗜魚熊掌味何殊，我愛君詩淡似秋。溫李只耍誇富艷，平平端合學蘇州。」黎以押蘇州字犯唱韻，非和詩體，贈書譏之。又贈一首曰：「馬辰遺俗古人殊，世代相移幾度秋。耨薩名官何

⁶³ 王晨光，〈朝貢與創作——越南使節燕行詩文化研究意涵探析〉，頁 267。

⁶⁴ 同前引，頁 260。

⁶⁵ 清水太郎，〈朝鮮使節とヴェトナム使節の中國での邂逅：虚構の交流〉，《전북사학》，31（全州：2007），頁 113-138。

意義，知君禮制異中州。」⁶⁶

文中提到黎時舉認為曹仲不符詩韻，重覆蘇州一詞，並贈書諷刺曹仲。曹仲後來以病為由告之無法對唱的關鍵，並指自己如果要強行繼續創作下去，或許有如淮陰侯韓信的背水一戰之效：「病餘思涸，甘心屏退。梯衝舞於前，而處女自守。君見淮陰之走水上軍，毋發趙人笑也。異日俟身健，當相就爭長詩壇。試觀老子據鞍顧盼也，幕中之籌，無容惜焉。穉薩本是方言，古之雲鳥，名官何義哉。交趾豈駢拇之義耶。」⁶⁷

然而，黎時舉也不甘曹仲的挑戰，反擊說：

彼淮陰之背水陣，正用兵法中紀律取勝。今君蹈襲唱詩徑用之韻，以兵法律之，則君失伍離次甚矣，將見棄甲曳兵而走，何暇據鞍顧盼哉？丈夫磊磊落落，墨甲筆鋒，千軍一掃，焉用幕中之籌。他日貴體安健，幸一相訪，謹命壇夫，嚴設旗鼓以待。交趾本一郡也，郡之北有南交關天耻山，故名郡以交耻。後誤以耻為趾，無怪乎君之承訛也。⁶⁸

即使清水太郎質疑魚叔權所記述的曹仲與黎時舉互相爭辯的故事是一段虛構的對話，但是這段虛實交替的交往論述，反可讓學界理解到朝鮮與安南未必如想像般和諧，彼此間交談可能隱藏著雙方針鋒相對、互相比較的痕跡。鐘鳴旦所倡議的文化相遇間的接觸，可用作思考兩地使節見面時的酬唱，雙方既同時是接受者，也是傳播者的接觸。曹仲以傳播者身分與黎時舉酬唱，把中國傳統經典作為朝鮮與安南較勁的材料；他也同時是接受者，接受黎時舉挑戰後，馬上反擊以捍衛自己的身分以及所代表的朝鮮。魚叔權虛構背後可說明安南作為文化競賽的對象，使朝鮮文人得以在東亞秩序中尋找自我認可的位置。

嘉靖六年（1527），後黎朝安南爆發內亂，權臣莫登庸（1483-1541）平定內亂並弒殺黎恭皇黎椿（1507-1527），建立莫朝。因莫朝長期對抗各殘餘勢力，未向明朝入貢。因此，嘉靖十九年明朝派出大軍壓境，莫登庸出降，明朝即將其國王身分

⁶⁶ 魚叔權，《稗官雜記》，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國譯大東野乘》（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1），卷4，頁753。

⁶⁷ 同前引。

⁶⁸ 同前引。

降格為從二品安南都統使司，作為懲罰。⁶⁹ 這點對於朝鮮如何看待安南有密切關係，如朝鮮中宗（李懌，1488-1544，r. 1506-1544）向入使北京的安珪（1501-1560）詢問莫登庸投降的情報，安珪進一步指出：「天子斷以為都統使，使之世襲，又不問貢獻之事，則略示威嚴，似不失朝廷體統而已，其實棄之也。」⁷⁰ 反映當時朝鮮對安南被降為都統使司，認為安南被明朝棄於朝貢宗藩體系之外。

1597 年，朝鮮李晬光（1563-1628）與安南馮克寬（1528-1613）在北京相遇。學者高度評價兩人的交流，認為此次交流象徵兩國間的情緣。⁷¹ 李晬光指：「休道衣冠殊制度，卻將文字共詩書。」⁷² 馮克寬也回應：「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聖賢書。」⁷³ 這種兩地雙方互相欣賞、互相敬重的文人交往，成為朝鮮與安南文人間的美談，並延續朝鮮與安南之間唱和與筆談的歷史。

不過，兩者的互動也潛藏著文化競爭。李晬光在唱和後，補充介紹安南一行人的外貌與行為。他指安南人外貌：「其狀率皆深目短形，或似獼猴之樣。」⁷⁴ 當安南人對李晬光的詩作有過獎之情，他記載：「使臣每見晬光等所為詩，擊節稱賞曰：『文章高了，自後必稱大手筆。』」⁷⁵ 但李晬光卻指「蓋以他國之文過獎如是也。」⁷⁶ 即他認為安南使節大概只是因為詩文作品出自他國文人而有所稱賞而已。

當時馮克寬代表推翻莫朝後重新建立的後黎政權出使北京，本希望明朝恢復國王封號。然而，明朝當時只封後黎君主為都統使司，該身分使朝鮮使節認為安南使者不能與己等同。當李晬光贈詩予馮克寬時，也提到「朝廷竟不准封王，只許仍前為都統使，一行猶動色相賀。」⁷⁷ 陸小燕與葉少飛的分析更指出，這影響到李晬

⁶⁹ 葉少飛，〈安南莫朝范子儀之亂與中越關係〉，《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31（南京：2016），頁 172-184。

⁷⁰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宗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18 冊（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68），卷 98，「中宗三十七年五月丁酉」，頁 32a。

⁷¹ 鄭永常，〈一次奇異的詩之外交：馮克寬與李晬光在北京的交會〉，《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1（臺北：2009），頁 345-372；徐浩修在 1790 年與安南使節交流時，也曾提到馮李二人間的關係。徐浩修，《燕行記》，收入成均館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上冊（首爾：成均館大東文化研究院，1962），卷 2，頁 73a。

⁷² 李晬光，《芝峯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66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88），卷 8，〈安南使臣唱和問答錄〉，頁 1a。

⁷³ 同前引，頁 1b。

⁷⁴ 同前引，頁 5b。

⁷⁵ 同前引，頁 6b。

⁷⁶ 同前引。

⁷⁷ 同前引，頁 2b。

光在詩中處處浮現對安南的輕視與不認同，⁷⁸ 例如他在詩裡常用「蠻」、「瘴」之詞等形容安南。⁷⁹ 又如李晔光指安南使臣曾對他說：「貴大國舊稱文獻之國，賤國非敢望也。」李晔光補充說：「朝會時，我國使臣為首立於前行，安南使臣次於後行，相接之際，每致恭遜之意。」⁸⁰ 這些事例都反映詩文的問答背後，充斥著各種政治願望所結合而成的競爭情景。⁸¹

陸小燕、葉少飛在文章中，進一步通過探討虛構的朝鮮人趙完璧曾在安南發現人人皆讀李晔光詩歌的事例，及馮克寬虛構海東逸士與金羊逸士的詩詞來代表朝鮮支持後黎復國的說法，說明彼此都需要借助對方來建立自我的文化認同。⁸² 安南與朝鮮間的詩文交流與認同角力的情況，一直存在於使節交流中。1760年，安南使臣黎貴惇(1726-1784)出使期間，曾與朝鮮謝恩正使洪啓禧(1703-1771)相互以詩歌酬唱，黎貴惇本人對這次經歷留下深刻印象，並將過程記錄下來：「與東國使臣相遇，結縞紵之誼，尺簡往復，……及與同幹唱酬瀟湘百詠。」⁸³

然而，在閱讀一些朝鮮史料時，卻未見洪啓禧對此次會面有深刻的書寫。唯一可見的材料，是洪啓禧出使期間，呈給朝廷的使臣別單，簡介了安南的衣冠制度：「安南、琉球、暹羅、西洋，皇朝時亦為朝貢，而其餘諸國絕遠，罕受中國節制，今則如期來朝。琉球則遣子弟入國子監，安南、南掌冠服稍有制度，安南則紗帽章服，頗與我相似。」⁸⁴ 是次互動的情感表述與想法則多於安南一方。黎貴惇曾在其《北使通錄·題辭》中提到：「沿途見中州官僚、士大夫問難談辨，殆如遇敵。又有朝鮮貢使，欽差伴送官，皆一時文豪，不以海外見鄙，累相接語。僕仰伏洪福，文字酬答之間，幸免輕哂，更見稱揚。」⁸⁵ 黎貴惇理解到出使不只是雙方純友誼的互動，也是一種文化比較，故他不想被對方嘲笑。他也曾經提到出使期間若「簡交寡言」，「必為人所鄙薄，而以彝官彝使視之矣。」⁸⁶ 由此可見，黎貴惇

⁷⁸ 陸小燕、葉少飛，〈萬曆二十五年朝鮮安南使臣詩文問答析論〉，《域外漢籍研究集刊》，9（南京：2014），頁396-397。

⁷⁹ 同前引，頁401。

⁸⁰ 李晔光，《芝峯集》，卷8，〈安南使臣唱和問答錄〉，頁9a。

⁸¹ 陸小燕、葉少飛，〈萬曆二十五年朝鮮安南使臣詩文問答析論〉，頁409-420。

⁸² 同前引，頁413-419。

⁸³ 黎貴惇，《北使通錄》，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漢喃研究院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第4冊，〈序〉，頁9。

⁸⁴ 鄭昌順等纂，《同文彙考》第2冊（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8），補編，卷5，〈庚辰冬至行正使洪啓禧副使趙榮進別單〉，頁41a。

⁸⁵ 黎貴惇，《北使通錄》，頁12。

⁸⁶ 同前引，頁13。

不只視這些交往是個人層面的交往，更代表自身的身分甚至是國家之間的競爭，避免在交往之中，被人嘲笑或看輕。雖然黎貴惇與朝鮮使節的交流未見於現存的《北使通錄》中，⁸⁷ 但朝鮮子弟軍官李義鳳 (1733-1801) 的燕行記錄《北轅錄》對此有豐富的敘述與補充。

李義鳳（初名李商鳳）在當次朝貢演儀期間（即十二月三十日），陪同父親書狀官李徽中在禮部參與禮節活動。期間，他們遇到了同年進貢的安南貢使，並對於他們的儀容、服飾等進行描述。⁸⁸ 其後，李義鳳找到了黎貴惇的同行副使，即李義鳳所指的三使鄭春澍 (1704-1763)：「余攬第三使之裾袖，筆書之曰：『貴官與姓？』」⁸⁹ 彼此閒談後，引起安南使節對於跟朝鮮使節交談的興趣。⁹⁰ 在正月元旦時，安南使節把邀請見面的書信給予朝鮮使節，並指兩國「萬里同文」，希望於公餘日子，少屈談歡，並以「東海南海心理相符」和「四海九州皆為兄弟」，展示彼此文化相近的關係。⁹¹ 而黎貴惇也向李義鳳展示他的謄本《群書攷辨》，但黎貴惇沒有把全書給他看，指他仍在校對。數天後，黎貴惇寄信到朝鮮的館舍，希望朝鮮的使節代表能夠為他的著作寫序：「僕於二、三年前輒信已見草成攷辨一書，醜雜管豹奚足以瀆大方慶雅願，弟想京國齊逢天涯知己，曾投針芥豈吝齒牙，故敢取就而取正者，祈為累加披閱不蘄裁訂併為之序。」⁹² 最終，正使洪啓禧為《群書攷辨》寫序，⁹³ 並收錄在其書中。洪啓禧在序裡提到：

安南國學士桂堂黎公奉使中國，僕遇之於鴻臚館，公眉宇疎朗，禮義嫻習，一見可知為一邦之彥。一日，公送書致所著《群書攷辨》，蓋取歷代載籍攷訂辨論，如坡翁之《志林》，蒙叟之《嚮言》，上下數千年，此得彼失，孰賢孰否，如是而安，不知是而危，靡不燭照而數計，掀翻已定案者有之，劈破相承之謬者有之，精識妙解湧見竹墨，其於朱陸之

⁸⁷ 同前引，王紅霞〈導言〉，頁 3-4。

⁸⁸ 李商鳳，《北轅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叢刊增補版》（KRPIA 資料庫，<https://www.krpia.co.kr/viewer/open?highlight=%e5%8c%97%e8%bd%85%e9%8c%84&plctId=PLCT00006852&nodeId=NODE06822122>），〈三十日庚子晴留北京〉，頁 469-470。

⁸⁹ 同前引，頁 471。

⁹⁰ 關於該次使行，李義鳳與各地使節的交往期程，可參考沈玉慧，〈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頁 117-118。

⁹¹ 李商鳳，《北轅錄》，〈辛巳正月初一日辛丑晴留北京〉，頁 500-501。

⁹² 同前引，〈初七日丁未晴留北京〉，頁 535。

⁹³ 「朝鮮國正使庭對狀元榮祿大夫几吏曹判書兼知弘文館提學世子右賓客洪啓禧拜序」。黎貴惇，《群書攷辨》（河內國家大學圖書館藏昇龍敬意堂影印刻本），頁 8a。

辨倦，又於篇末者，尤可見學術之純正，文亦怡然理順，有風行水上之意，無艱辛鈎束之態，即鬻可以知全鼎矣。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公其庶矣乎？⁹⁴

及後書狀官李徽中也致簡，稱這次行程遇上奇人，獲得奇書，非常讚佩，肯定黎貴惇的學問。⁹⁵ 黎貴惇對於遇上這些朝鮮使臣有著深刻的記憶，黎貴惇邀請這些朝鮮友人題詩作序，也得到對方正面的回應，黎貴惇不僅找了洪啓禧撰序，也請朱佩蓮、⁹⁶ 秦朝釘等清文人評閱，⁹⁷ 可見黎貴惇藉著使行，得到他者的認可，來肯定自我的文化水平。兩地的燕行文獻重現彼此文學切磋的經歷，但彼此欣賞背後，可見更為主動的是安南黎貴惇一方，朝鮮對安南未有特別深刻的敘述。以李義鳳為例，他對安南的禮儀、服飾、風俗感到興趣，但只作簡單敘述。⁹⁸ 安南一方卻積極邀請朝鮮使節，尋求他們的認同。

1790 年西山朝皇帝阮惠改穿清服入貢接受清朝冊封。葛兆光指出阮惠穿著冕旒衣冠的舉動是一種承認清國與文化的象徵，令乾隆感到歡喜，但是朝鮮認為大明才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故心裡感到不滿，他以此事件說明「各國間的文化比賽」。⁹⁹ 葛兆光的文章雖然提到朝鮮使節對安南使節改穿清服的想法與批評，但只限於討論徐浩修的自說自話，並未論及安南方面。然而，葛氏所說的文化比賽，應可更進一步說明，他者的行為成為朝鮮與安南雙方藉著對方而呈現自我的文本。

上述橫跨兩世紀的安南與朝鮮相遇與互動的例子，除了看到因文化相似而有題詞作詩的交流外，也可看到彼此在文化地位與環境因素的影響下，與其他朝貢國使節接觸時，他們的心態與對應，其實充斥著各種政治對應與文化認同的考量，最終利用他者來呈現自我，或表述自己的國家和文化。1790 年的例子可以更進一步說

⁹⁴ 同前引，頁 6b-7b。

⁹⁵ 同前引，〈附朝鮮國使小簡〉，頁 8a-9a。

⁹⁶ 乾隆七年 (1742) 壬戌科進士出身。慶桂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10 冊，卷 116，「乾隆七年五月壬申」，頁 107。

⁹⁷ 秦氏為乾隆十三年戊辰科進士出身。同前引，卷 315，「乾隆十三年五月乙巳」，頁 175。

⁹⁸ 林侑毅以朝鮮使臣出使後的逐日記事〈使臣別單〉為研究中心，梳理自 1673 年到 1881 年期間，十多種不同使節關於安南形勢的記載，指出不少朝鮮使臣即使知道安南各朝都有派遣使節進貢北京的習慣，他們對安南的認識與興趣，仍然停留在比較表面的議題。林侑毅，〈由《同文彙考》論朝鮮後期使臣對周邊國家的認識——以對臺灣鄭氏政權及安南西山阮朝的論述為中心〉，《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35（首爾：2016），頁 343-371。

⁹⁹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上海：2012），頁 8-10。

明，安南朝廷與文人有意識地把自己在朝貢活動的表現作為強化自身文化認同與國家建構的依據，而在安南與朝鮮使節間的酬唱與互動中，更可看到這種意識的存在。那麼 1795 年代表西山政權的阮倓，在北京與朝鮮使節接觸的過程如何？他的行動反映著怎樣的文化意識？

四、1795 年阮倓《華程消遣集》與安南、朝鮮使節的競逐

清朝建立以後，朝鮮與安南使節交流的次數眾多，1691、1704、1719、1760、1773、1779、1790、1795 等年的交流均留下歷史記錄。¹⁰⁰ 1790 年安南西山朝國王阮惠「親自」謁見乾隆皇帝，使得朝鮮使節對安南代表特別留意，並有更豐富的描述和評論。

參與 1790 年朝鮮燕行使團的柳得恭 (1748-1807) 在其紀事詩裡提到：「戈船萬舳振皇威，南國君臣叩謝歸。三姓如今都冷了，阮家新春滿洲衣。」¹⁰¹ 副使徐浩修 (1736-1799) 甚至上前查問西山陪使潘輝益 (1751-1822)：「貴國冠服，本與滿洲同乎？」¹⁰² 朝鮮使臣回國後，書狀官成種仁 (1751-?) 向國王正祖 (李祘，1752-1800, r. 1776-1800) 報告後黎朝被阮惠西山軍隊消滅後，乾隆皇帝選擇廢棄後黎愍帝 (黎維禘，1765-1798, r. 1786-1789)，轉為封阮惠為新安南國王的具體過程與情況：

……黎維禘已棄印潛逃，自無復令立國之理。即遣官費勅，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光平感激不已，遣其家臣六人，一修賞貢，一謝封典，請於今年三月日，自該國起程，趁八月上京，皇帝大加褒美，特賜帶。又令內閣，議定該國王上京時，沿途官員相見儀註，來使六人，亦皆厚賜，而每於宴班，許令參坐。其人雖解文字，而貌甚孱劣，俱着戲子蟒袍，與該國舊制大異云。黎維禘失國之後，來住廣西省，其徒屬之隨到者，為九十戶。皇帝賜維禘四品爵，治第於安定門外。將並致燕京，而館穀

¹⁰⁰ 清水太郎，〈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の事例を中心に〉，《北東アジア文化研究》，12 (鳥取：2000)，頁 15-31。

¹⁰¹ 柳得恭，《泠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260 冊 (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0)，卷 4，〈熱河紀行詩·安南王〉，頁 33a。

¹⁰² 徐浩修，《燕行記》，頁 73b。

之，此出於爲光平，絕後患之意。蓋安南內訌，厥由光平而始，既興師問罪，旋又奪此與彼者，殊非討有罪，繼絕國之道。故燕京之人，顯有不平之論。¹⁰³

西山阮氏穿著清服，被朝鮮人嘲為「戲子蟒袍」，朝鮮使臣回國傳話指「燕京之人」表示對後黎被西山所滅的事件「顯有不平」。這次會面使朝鮮君民對這個新興安南政權帶有負面想法，也影響往後使節如何看待來自安南西山朝的使團。西山朝成立後，有三次使行都是特殊的入貢安排，而非恆常入使活動。除了 1790 年阮惠使團入京外，在 1789 年，安南已派出使節答謝乾隆派使節封冊安南國王，當時阮倬便是該使行的副使。¹⁰⁴ 而 1795 年，安南又派使團赴華參與乾隆帝禪位，這次西山朝派出的使節正使為阮光裕，副使為杜文功和阮倬。¹⁰⁵

根據《世譜》所述，阮倬在 1789 年便代表西山擔任副使前往北京，獲侍宴於紫光閣，並奉賡乾隆御製詩。宴後，乾隆加以賞賜，以示對其文采的認同。阮倬的《華程消遣集》前集便記載首次出使的各種見聞，其中有詩述及在紫光閣侍宴的情況：「風和日暖艷陽天，五色祥雲映玉軒。紫閣焜煌關綺席，金爐拂鬱惹香煙。喜照王命森冠帶，恍訝仙門落管絃。花宴幸陪知分外，精神爽朗思飄然。」¹⁰⁶ 阮倬在是次使行中，除了紫光閣的侍宴詩、在御製節前宴席題句和記載圓明園駕泛龍舟外，並沒有在詩集中呈現其他特別的經歷。

1795 年，阮倬因乾隆皇帝禪位而奉差再次出使北京。當年，阮倬不但能參與千叟宴，再奉應制詩，更和不少清廷官員、朝鮮國使臣以詩札互動，被譽其名聲「遂知名上國」。¹⁰⁷ 同一時間，朝鮮一方先後有兩批使節因不同的目的出使北京。第一批是當年十月十日出發的三節年貢兼謝恩使，即朝鮮最典型的年度貢使。當次使團的正使是閔鍾顯 (1735-1798)，副使李亨元 (1739-1798)，書狀官趙德潤

¹⁰³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正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46 冊，卷 29，「正祖十四年三月丁未」，頁 57b-58b。

¹⁰⁴ 朝鮮的《正祖實錄》曾記載譯官張濂的見聞內容，也提到 1790 年初阮倬參與在該年的一次歲貢使行之中。同前引，頁 60b。

¹⁰⁵ 《清實錄》載有安南與其他各使節的入使代表名單，詳參慶桂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26 冊，卷 1494，「嘉慶元年正月壬戌」，頁 998。

¹⁰⁶ 阮倬，《華程消遣集》，〈紫光閣侍宴〉，頁 136。

¹⁰⁷ 阮儼等編纂，《驩州宜仙阮家世譜》，頁 43b-44a。

(1741-1821)。¹⁰⁸ 為慶祝乾隆帝禪讓和嘉慶帝即位的使團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發，由正使李秉模 (1742-1806)、副使徐有防 (1741-1798) 和書狀官柳畊 (1756-?) 率領。¹⁰⁹ 這一年朝鮮派出了兩團燕行使團，所有官員均未撰寫相關的燕行記錄，即使是作為書狀官的柳畊和趙德潤，也沒有在其使行聞見報告中向朝廷提及有關安南使節的情況。¹¹⁰ 因此，所謂阮倬「知名上國」未必是事實，可能只是誇譽。我們從阮倬的詩作等相關文獻，特別是朝鮮使臣的反應，可發現東亞使節交涉過程中的文化競爭意涵。

《華程消遣集》後集記載阮倬第二次使行的經歷，使團於 1795 年秋天出發，翌年秋天才回到安南。這次阮倬在華停留期間獲得多位在京官員的關照，如《世譜》：「北朝士大夫多設宴款接饋送方物，以詩文相贈。」¹¹¹ 這次行程有很多對外接觸，後集與前集的記載內容明顯不同，前集多應制和風景詩，後集則有更多跨國交涉與對話的意識。

阮倬的姪子阮衡（又名阮倓，1771-1824）在撰寫的序中說到：「國之大任有三，相也、將也、使也。治亂在於相，勝負在於將，榮辱在於使臣，三者有國之大任者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宰相總其大綱而已。智者出謀，勇者出力，主將執其中樞而已。若夫馳一兩之東，當萬里之變，一言以為重，一言以為輕。使乎，使乎，豈易云乎哉？」¹¹² 使臣的文學酬唱，不只代表自己，也代表國家的榮辱。阮衡進一步說出使者必須有一定的文學水平：「國初通好北朝，公辰奉使有名，迨嘉慶即位詔，舉君子通達國體嫻於辭。」他說當時朝野認為只有阮倬可擔任此工作：「今可充北使者，朝議以公應選。」而安南帝亦指：「俞往哉，是能不辱朕命者。」¹¹³ 可見使節的選派不但會考慮使節身分地位，也要衡量其文學水準，希望能夠不辱國體，而阮倬的一舉一動，就是對外展現安南文化水平的重要象徵。當時西山初立，阮倬是少數具文學修養、願意出仕的官員，故獲派代表西山朝兩次出使

¹⁰⁸ 「召見冬至正使閔鍾顯、副使李亨元、書狀官趙德潤。辭陛也。」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正祖實錄》，卷 43，「正祖十九年十月丁亥」，頁 36b。

¹⁰⁹ 「以李秉模為進賀正使，徐有防為副使，柳畊為書狀官。」同前引，「正祖十九年十一月癸丑」，頁 53a。雖然當時在朝野有爭議應否疊派使團到賀，但是朝鮮朝廷最終認為「在我國，無使臣疊送之弊，在彼國，亦知殊禮事大之義，可謂兩便矣。」最終決定派出另一團前往北京慶賀乾隆傳位於嘉慶。同前引，「正祖十九年十一月丙寅」，頁 61b。

¹¹⁰ 鄭昌順等纂，《同文彙考》第 4 冊，補編，續卷，〈使臣別單·進賀兼謝恩行書狀官柳畊聞見事件〉，頁 35a-36b；〈乙卯冬至兼謝恩行書狀官趙德潤聞見事件〉，頁 33b-35a。

¹¹¹ 阮儼等編纂，《驩州直仙阮家世譜》，頁 44a。

¹¹² 阮倬，《華程消遣集》，頁 165。

¹¹³ 同前引，頁 166。

北京。

相對於第一次入京，阮倬第二次出使中有更多的情感流露。因為行程變更，出使的時間加長，記錄的景象也特別豐富。他的〈至京喜賦〉提到這次入京的豐富情感：「飄又周道策吟鞭，秋盡冬殘復到燕。卒轡聘窮鄒兗國，星槎泛抵斗牛邊。征人情思猶前度，大地風光勝昔年。玉帛一庭來萬國，衣裳再挽舜堯天。」¹¹⁴ 雖然安南至北京的行程遙遠，但能夠再次與各雅士一同敬賀天朝喜事，阮倬也是相當期待的。

入京後，阮倬與使團成員一同參與各種禮儀，包括元旦時向皇帝奉獻兩首應制詩。¹¹⁵ 乾隆皇帝為了與民共享喜悅舉行千叟宴，阮倬在宴中也再次創作應制詩，供皇帝鑑閱，均獲得皇帝賞賜。¹¹⁶ 這些雖然是朝貢禮儀中典型的交流，但對阮倬或安南人來說，均為天朝對自我及其詩作難得的重視。¹¹⁷ 他事後所寫的〈侍皇極殿千叟宴預頒壽杖喜賦〉記載千叟宴的熱鬧與繁華氣氛：「皇極階前叩上皇，鬚眉勝會恰韶陽。御珍分賜玻璃器，法醞孟斟瑪瑙觴。簫鼓驚聞天上樂，衣冠喜襲禁中香。齡叨得頒仙杖，錫慶先徵壽等長。」¹¹⁸ 千叟宴是一場難得的文化盛宴，各地年長王公大臣以及外地賀正使臣都受邀赴宴，場面壯觀。¹¹⁹ 千叟宴後，在圓明園舉行的元宵宴，阮倬也再次應制。可見，阮倬的書寫不只是簡單地對異國生活的抒發，而是代表國體地位的表述。他出席所有活動，抒發與描寫的景象，都應該在國家出使的脈絡下探討。不過，在其文集中，並沒有很多關於他與清文人應酬的內容，¹²⁰ 因此《世譜》所言獲北朝士大夫的重視，應更多是安南社會的期盼。以往的學者主要從文學與文化交流的角度來探討兩地的互動，但阮倬的出使強調代表國家與文化競爭的面向。前文已言及，所謂阮倬「遂知名上國」很可能是阮倬族人建

¹¹⁴ 同前引，頁 226-227。

¹¹⁵ 同前引，頁 229-230。

¹¹⁶ 同前引，頁 229-231。

¹¹⁷ 阮倬在〈旅中得興〉指：「兩持使節觀神京，四上詩箋達聖明。」儘管同詩裡他曾指「欄遇風塵勞苦處」，旅程的遙遠有不少辛勞的地方，但他卻感到使行之旅使他不枉此生：「桑蓬差不負斯生。」同前引，頁 240。

¹¹⁸ 同前引，頁 231。

¹¹⁹ 同期入京的朝鮮使團書狀官柳畊也在回國後的報告裡提到具體的參加人數，詳參鄭昌順等纂，《同文彙考》第 4 冊，補編，續卷，〈使臣別單·進賀兼謝恩行書狀官柳畊聞見事件〉，頁 35b-36a。

¹²⁰ 大多只收錄他贈於他人的詩作，而沒有記錄原韻或和答內容。故是否清人均讚譽，這一點是有所保留的。

構的說法，未必符合事實。¹²¹ 詩集呈現阮倬努力在禮儀交往過程中代表安南，展現文化競爭的意識。

阮倬是年在北京與兩組朝鮮使臣相遇，他分別與謝恩使副使李亨元和慶賀使副使徐有防有交流，共有九組酬答和唱。他展開和答的〈東朝鮮國使臣〉提到兩國文化毫無差異，彼此難得在北京見面：「漲南修阻渤溟東，邂逅惟相帝闕中。經史前傳無所異，衣冠古制有相同。比肩喜得趨蹌近，對面對憑說話通。別後欲知依望處，一年一度挹春風。」¹²² 阮倬的書柬展開了幾個酬唱的和答意象：東南距離、雙方在北京邂逅、雙方的文化相似、與對方見面時所感受到的喜悅，以及別後的情形。

李亨元的和韻，禮貌地回應阮倬自己亦有同樣想法：「扶桑積水在東南，喜在乾坤一氣中。海月星槎賚玉遠，驛梅瀛沼飲水同。赫蹄珍重三行問，象舌依稀兩地通。他日漢儀森去日，遙將牙扇奉仁風。」¹²³ 不過，阮倬認為彼此間是「對面對憑說話通」，李亨元卻表示：「象舌依稀兩地通」。換句話說，阮倬認為彼此無語言障礙，能順暢溝通，李亨元卻說兩地彷彿通過譯者稍微得以溝通。

此外，阮倬在唱和詩作裡也刻意強調兩者的文化相近意識，例如「經史前傳無所異，衣冠古制有相同」，強調朝鮮與安南衣冠均與古制相同且符合漢文化的傳統，藉此抬高安南的文化地位。阮倬詩句提到「玉闕衣冠喜近參」，¹²⁴ 但李亨元卻回應「萬里衣冠一席參」，¹²⁵ 藉此轉移了話題，不談阮倬希望借衣服相似而拉近雙方文化相似的關係，只說天下各國一同參與朝賀活動。當時阮倬身上穿的已經是清服。阮倬繼續嘗試溝通，延續話題：「綠鴨朱鳶千萬里，悠悠滄海限東南。碧津風浪愁遙隔，玉闕衣冠喜近參。心裏情真須見照，口頭音異每懷慙。輶旋豈有逢重日，相遇無辭抵掌談。」¹²⁶

在外交場合之間的酬唱，使者一般不會不回覆，否則被視為無禮。故李亨元再次回敬：

¹²¹ 在《華程消遣集》前集，阮倬詩集提過的清文人，大多是地方官員，如漢陽府官員、翰林等，與一般理解知名文人界別的想法，有一定的差異。阮倬，《華程消遣集》，頁 143-145。

¹²² 此句在引用的文獻版本中印為「比肩比喜得趨蹌近」，據范光愛的研究所指，詩中第二個比字應為重覆字故刪去。同前引，頁 264-265；Phạm Quang Ái, "Hoan Nam sứ giả Nguyễn Đê xướng họa cùng sứ thần Triều Tiên," pp. 71-72.

¹²³ 阮倬，《華程消遣集》，〈附錄朝鮮國副使禮曹判書李亨元和韻體〉，頁 265。

¹²⁴ 同前引，〈再柬朝鮮國使臣〉，頁 266。

¹²⁵ 同前引，〈附錄朝鮮國副使禮曹判書李亨元和體〉，頁 266。

¹²⁶ 同前引，〈再柬朝鮮國使臣〉，頁 265-266。

使者來辰重驛否，伏波銅柱海之南。偏邦眼目中卅大，萬里衣冠一席參。鐵芥交情歸不隔，珠璣新什和多慙。雪泥鴻爪留名地，抵上猶愈夢裡談。¹²⁷

綠鴨，指的是今天的鴨綠江，是中國與朝鮮的界江，河流像鴨頸之色而得名。¹²⁸ 鴨綠江是朝鮮使團前往北京的出發點，也是朝鮮半島北端之境的代表詞。據當代越南學者范光愛的分析，朱鳶意指安南，阮倬是以一個更具在地意識的歷史典故來取代中國古籍意識較強的事實，以強化安南的文化地位。¹²⁹ 朱鳶雖然是屬交趾郡下的地方，但在安南史料的脈絡，朱鳶更具體意指萬春國君主趙光復的故鄉。¹³⁰ 南北朝期間，交州一帶地方士族領袖李賁（503-548）起兵對抗梁朝，控制著當時梁朝管轄下的交州和德州，並稱帝建「萬春國」。¹³¹ 李賁病逝後，輔助李賁的趙光復自立為王，曾於 550 年擊退陳霸先（503-559）率領的梁軍。¹³² 十五世紀後黎朝吳士連開始修編《大越史記全書》時，把陳朝黎文休（1230-1322）編撰《大越史記》及後黎朝潘孚先（1370-1482）編纂《大越史記續編》的材料完備並增加「北史」、「野史」等材料。其中，吳士連把交州屬西漢前的鴻龐氏傳說、蜀氏甌雒國傳說與趙陀的南越國等收為正紀前的外紀，並以「屬西漢紀」與「屬東漢紀」來描述西漢時期安南範圍內的史事。此外，根據《大越史記全書》的敘述，李賁與趙光復的萬春國則是第一個非屬中國的當地政權。¹³³ 因此，阮倬這裡以朱鳶對比綠鴨，不但是一種在地自我呈現的安南，也是利用綠鴨來肯定朱鳶安南的地位，朝鮮的相似性成為了阮倬詩裡對安南的自我呈現與形塑的「文本素材」。

¹²⁷ 同前引，〈附錄朝鮮國副使禮曹判書李亨元和體〉，頁 266。

¹²⁸ 「馬訾水一名鴨綠水，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俗名之。」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86，〈邊防二·東夷下·高句麗〉，頁 5015。

¹²⁹ Phạm Quang Ái, “Hoan Nam sử giả Nguyễn Đê xướng họa cùng sử thần Triều Tiên,” pp. 73-75.

¹³⁰ 不過，《大越史記全書》也列明「按舊史不載趙越王，桃郎王。今采野史及他書，始載越王位號，附桃郎王，以補之。」吳士連，《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上冊，外紀卷 4，〈趙越王紀〉，頁 150。

¹³¹ 「帝因勝敵，自稱越南越帝。即位，建元，置百官。建國號曰萬春，望社稷至萬世也。」同前引，〈前李紀〉，頁 148。

¹³² 「王姓趙，諱光復，趙肅之子，朱鳶縣人。威壯勇烈，從南帝征伐有功，拜左將軍。南帝薨，乃稱王，都龍編，遷武寧。……王居澤中，以梁兵不退之故，焚香祈禱，懇告於天地神祇，於是得龍爪兜鍪之瑞，用以擊賊。自此軍聲大振，所向無敵。俗傳澤中神人褚童子，時乘黃龍自天而下，脫龍爪付王，俾載兜鍪上，以擊賊。」同前引，〈趙越王紀〉，頁 150。

¹³³ 同前引，卷首，頁 71。

除了以朱鳶相比綠鴨外，阮倬也表示雖然兩地因海洋而分隔在東南兩地，即使在重重地理與語言的困難下，阮倬仍感覺雙方文化相似而欲拉近彼此關係，因此希望下一次可深入對話。但如仔細觀看李亨元的回應，雖然也應和阮倬的詩句，但是李亨元花更多的心思應對。他的答體引用中國文史的典故呈現意象，而非像阮倬只用本國的古典或是純粹的情感抒發。例如李亨元以《三國志》的鍼芥相投來比喻大家投契，又用唐代比喻優美詩文的珠璣來稱讚阮倬的詩句，最後用蘇軾所作的「雪泥鴻爪」比喻兩地交往留下深刻印象。這些例子都反映李亨元用心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李亨元並沒有回應朱鳶與綠鴨的詩意，甚至避開只有安南史料才載的典故「朱鳶」來代表安南，而採用東漢馬援於交趾立銅柱的典故。¹³⁴ 這可能因為朝鮮只能掌握中國經典，不能確認朱鳶故事的真偽；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在禮儀場合，若談論不肯定的史料，有僭越之嫌，會造成失禮局面。酬唱文本放置在東亞世界交流，可發現安南與朝鮮雖然共屬漢文化圈，但安南希望呈現自己獨有的視角，而朝鮮卻相當小心，避免造成失禮，外交場合符合禮儀是朝鮮更關心的，展露朝鮮士大夫對傳統經典的熟悉程度。由此可見，酬唱的過程彼此各有需要，阮倬藉著詩句表達他對朝鮮文化的尊重，並借朝鮮比喻安南有共同文化水平；李亨元卻重視合禮，避免用錯意象，流露朝鮮士人更高的古典文化水平。

雙方都以「東」象徵朝鮮，「南」象徵安南，沒有明顯高低之分，而阮倬收到和詩後，也以「異地同風元自古，日東文物似天南」¹³⁵ 將安南與朝鮮的文化相提並論。西山朝作為新立之國，阮倬以歷史悠久的朱鳶來對比綠鴨、以衣冠自古相近、東南相隔但相似等三方面來以東譽南，借朝鮮的文化水平與地位來認可新立西山國代表安南在朝貢秩序的地位，但李亨元則比較小心，盡量用為人熟悉的意象來表達互相尊重的友誼，甚至以公務繁忙拒絕回信。但阮倬為什麼希望不斷與朝鮮使臣交談？在該書末裡最後一句解釋到：「歸來收拾瑤章訂，留作炎方一笑談。」¹³⁶ 意指他希望把這些難得的跨國友誼酬唱，留作出版，以供該國文人留念。

李亨元拒絕回應後，另一使臣徐有防則代替李亨元回應：「莊莊俯仰大輿堪，日出箕東水盡南。逖矣封疆迷極望，忽同〔……〕序喜相參。降衷自古人兼我，贈

¹³⁴ 根據晉朝以後的資料顯示，公元 43 年，東漢將軍馬援平定二徵夫人的叛亂，於交趾一帶豎立兩個銅柱，以示漢朝南界。為確保界線安排，馬援對外宣稱「銅柱折，交趾滅」。因此，東亞各界長久以來都在探索馬援銅柱何在，此亦成為中國歷代與安南交涉的重要議題。Liam C. Kelley,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pp. 5-7.

¹³⁵ 阮倬，《華程消遣集》，〈再柬朝鮮國使臣李亨元〉，頁 266。

¹³⁶ 同前引，頁 267。

別如今悵更慙。莫惜方音難解意，憑將文字替酬談。」¹³⁷「箕東」是以箕子東遷後朝鮮日漸形成中華文化社會的代指，¹³⁸而「盡南」則是中華世界最盡頭的安南，來自同一個「日出」，也回應了阮倬「日東文物似天南」的意象。而徐有防也指兩地相隔極遠，在天地間一同參加朝貢盛會，表示喜悅，即使大家語言無法溝通，但雙方可憑文字代替酬談。

阮倬回答：「道合情親兩所堪，箕東不以異南交。孔門禮樂原相與，燕闕旌輶偶比參。珍貺雅投知意厚，瑤章莊接覺形慙。三韓道學今何在，心照無妨筆舌談。」¹³⁹阮倬回應雙方一見如故，特別指安南非「異南」，即是與代表東方的朝鮮在禮樂上是一致的，所以他說「孔門禮樂原相與」，是故雙方文化相似可在「燕闕」交往。而徐有防也說到「莊莊俯仰大輿堪」，意指朝鮮與安南共同參與朝賀聖事，但是阮倬卻把和應的重點放在雙方的友好感情：「道合情親兩所堪。」同時，阮倬希望可以繼續書信往來請教「三韓道學今何在」的學術問題。可惜，徐有防以有公事在身，未有回函。最後，阮倬在禮部餞宴時再向朝鮮使臣撰詩贈別，指不知何時何日可再相遇，¹⁴⁰而朝鮮一方再次由徐有防作和詩紀念雙方的難忘之情。¹⁴¹

回顧各組詩作，阮倬都希望在各段詩句裡重視朝鮮與安南的地位平等，而朝鮮派員回應阮倬詩唱時，也是由同為副使的李亨元和徐有防先後禮貌回應。由此可見，從文化競賽的角度思考，安南期望能與朝鮮平起平坐，而朝鮮的回應無論是文字使用、文學意象，或是回應者的身分，均反映朝鮮的考慮是因為合禮，避免失禮。相較於阮倬為安南爭文化秩序的平等，朝鮮使臣更重視在儀式、交談以及文字使用上如何能不失禮。

阮倬也在不同渠道或字句裡說明，安南並非南夷之國，而是與來自東方的朝鮮一樣，嘗試走向中華的國家，特別是當時西山朝剛立，阮倬不只是代表安南，也代表著這個新立國家，希望藉著東亞使節間的對話，在東亞世界秩序裡爭取應有的地位或文化的認同，這幾段短短的酬唱，也說明「綠鴨朱鷺千萬里」不是單純感嘆兩

¹³⁷ 同前引，〈附錄朝鮮國副使吏曹判書內閣學士徐有防〉，頁 267。

¹³⁸ 在十九世紀末以前，箕子朝鮮之說，基本是朝鮮士大夫的文化起源的主流論述。直至 1908 年，申采浩提出朝鮮民族是檀君後裔以後，箕子朝鮮的存在才有學術與社會的爭議。但在十八世紀末的東亞，箕子東遷基本上是士大夫的起源認同。范永聰，〈檀君與箕子書寫文化溯源——兼談其歷史應用問題〉，《東亞文化》，55（首爾：2017），頁 201-240。

¹³⁹ 阮倬，《華程消遣集》，〈和答朝鮮國副使徐有防〉，頁 267。

¹⁴⁰ 在阮倬回國後不久，西山便被 1802 年建立阮朝（大越南國）的阮福映（1762-1820）率領的軍隊消滅。

¹⁴¹ 阮倬，《華程消遣集》，〈附錄朝鮮國徐有防〉，頁 268。

國的距離，而是借朝鮮來嘗試演繹安南的文化水平與東亞世界的秩序位置。相反地，朝鮮對於這次的會談似乎不斷抗拒，例如李亨元和徐有防先後收到阮倬的來柬時，會先禮貌和答，但阮倬再和答時，兩人均以「伊謝以公忙，不能屬和」為由，拒絕了阮倬的邀請。無疑當時慶賀新帝登極，工作相當繁忙，但與 1790 年徐浩修與潘輝益帶著好奇心明知故問，了解西山朝情形相比，阮倬實未能吸引李亨元與徐有防二人願意詳談。阮倬多番邀請李、徐二人進一步深入交流，但只換來詩句以禮帶過。可見，安南單方意願希望拉近安、朝兩國關係。

而且在 1790 年時，安南使臣改穿清服入使，朝鮮使臣都看在眼內。五年之後，這樣的文化記憶並不容易抹去。文獻未見朝鮮使臣對這次會面有任何深刻的印象，但為了符合禮義之邦精神的朝鮮使臣，則願意配合，並沒有在文字中為難安南，反而引經據典，提高詩作的意象，以印證了這次的「緣鴨朱鷺千萬里」的跨地域友情。表面是雙方互動，但實際上是安南單方意願，希望朝鮮在文化傳播過程中不會遺忘安南。

美國學者黎明愷 (Liam C. Kelley) 在其有關安南燕行詩集的專著裡有專章探討安南與朝鮮使臣交往的詩集，他分析馮克寬與李晔光、胡士棟的例子，指出除了與中華帝國君主接觸外，與朝鮮使臣相遇也是同樣重要的文化實踐過程。他們希望自己不被遺忘，讓朝鮮使臣寫在其詩集或留在記憶中。¹⁴² 可見，兄弟之情背後反映的是，朝鮮成為安南自我認同的文化媒介。雖然黎明愷沒有明確提出文化競賽觀念，但是安南與朝鮮的官方及非官方的交往，確實呈現一種互相比較與較勁的意識。阮倬、李亨元與徐有防的案例顯示，安南使節有文化競賽的目的，他們借這種交際媲美朝鮮，強化自我的認同感，借朝鮮肯定自我，回安南後得以留下記錄，供文人認同。即使這些舉動未能得到正面的回應，但是阮倬的酬唱以及朝鮮人唱和的記載帶回安南後，相信有助於安南士大夫認可西山朝政權的合法性，從而緩和西山朝的內部不穩。¹⁴³ 同時，是次酬唱對於阮倬本人建立自身在安南的文壇地位也有一定的幫助。

¹⁴² Liam C. Kelley,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pp. 182-192.

¹⁴³ 後來編撰的《大南正編列傳初集》記載阮倬的弟弟阮攸生平時，形容阮攸「有文才，負氣節，不肯免偽」，即指他沒有就任西山朝。不願為西山朝效力的記載，也經常出現在這些 1790 年代活動的安南士大夫的生平之中。儘管《大南寔錄》編修者往往以「偽西」來標籤西山的不正當性，自然對這些西山朝的批評大書特寫，但仍可反映西山朝在內受到一定的文化挑戰，需要借助清朝的認可以及朝鮮人對自身的和應，才可在這種環境中維繫權威。關於阮攸的生平，詳參張登桂等修，《大南寔錄》第 4 冊，《正編·列傳初集》，卷 20，頁 8a-8b；關於西山朝的權力秩序建構的問題，詳參 George E. Dutton, *The Tây Sơn Uprising*, pp. 117-118.

相對地，朝鮮使臣的不積極參與，使學界無法窺探當時的交際感受，但留下來的詩句卻可說明朝鮮重視禮儀，避免出現失禮的情況。朝鮮以不失禮為大前提，與安南較勁來確認自己的地位有明顯的差異。¹⁴⁴ 與他者交涉期間，使節們能夠保持不失禮，一字一句均引經據典，展示文學水平，用字用得規範，而且更符合自身國家的禮儀。由此可見文化競賽的意識在東亞各國交流時始終存在，不同國家會根據其社會與文化各取所需，以對方作為文化競賽的對象，從而在相遇的過程裡呈現自我。因此，無論安南還是朝鮮都各有所需，利用對方成為自我呈現的依賴文本。

五、結論

黃俊傑說：「數千年來的東亞文化交流圈並不是一場交響曲演出，……在中國周邊的日本、朝鮮與越南經由交流活動而形成自己的主體性之過程中，『中國』是『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但是卻不是指揮周邊國家『演出』的唯一的『中心』。」¹⁴⁵ 說明了雖然事情發生在中國，但中國不一定主導著交流的過程，然而中國所訂下的禮儀與交涉安排，促進各國互相交流，從而形成自我主體性的一部分。雖然過去已有學者對安南和朝鮮燕行材料有精闢的分析，但未能觸及文化競爭的面向，本文試圖把文本放置在東亞世界的交流脈絡中觀察兩國使節的對話，指出在這些交流活動中，正流露出也形塑著自我認同與國家文化意識。

過去朝鮮與安南在北京的接觸成為了東亞世界交流的典範。兩地經由中國所規限的交流活動，認識彼此，從而各自形成不同的文化意識，是東亞世界獨有的文化意象。兩地士大夫因接觸他者，產生不同的想法，有意與無意之間進行各種文化競賽，在與對方文化較勁的過程中，從而建立自我的表述與呈現。

1789 年和 1795 年，阮倬代表只有短暫國祚的西山朝出使北京，參與嘉慶帝繼

¹⁴⁴ 朝鮮使臣金景善參與禮儀活動時，曾發生秩序錯置的問題：「聞通官輩傳言，禮部侍即被重勘，問其由。則今日宴席令琉球使先登殿上，朝鮮次之，以做錯為罪云。」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0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卷 3，〈留館錄（上）〉，「壬辰年十二月三十日」條，頁 321。雖然是次禮儀出錯不在朝鮮一方，但可知禮節出錯將會使國家面臨極大的危機。因此，禮儀對朝鮮一方是相當重要的文化考量。

¹⁴⁵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東亞觀念史集刊》，2（臺北：2012），頁 60-61。

位後的正朝典禮與乾隆特別安排的千叟宴。清朝提供的文化競爭與接觸空間，¹⁴⁶讓阮倬能夠在北京接觸到各級官員，以及來自不同朝貢國的使臣。其中，朝鮮使臣是阮倬刻意接觸、欲與之酬唱的對象。阮倬積極展開各類話題，但朝鮮使節冷淡地回應，反映朝鮮與安南之間的酬唱活動不只是單純的聯誼與互相認識的過程，而是一種跨文化間的比較與競爭。安南希望借朝鮮的文化水平來抬高自己在東亞的地位，而朝鮮使臣卻只是應酬阮倬，並沒有進一步加深交流的意願，朝鮮使臣更看重的是外交場合的禮儀。另外，朝鮮並沒有文獻記錄這些酬唱與交流；相對地，安南使節積極營造雙方友好關係，而留下豐富的歷史記錄。

東亞世界文化交流媒介人物的情感與意識，一直是學者研究的重點主題。阮倬詩裡所呈現的與朝鮮使節的唱和，不只是漢文學的抽象意象，更反映了東亞國家間的文化競賽元素，如何成為呈現自我的途徑。葛兆光以亞洲視野重探 1790 年乾隆帝八十壽辰慶典，指出朝貢圈中的各國如何在朝貢秩序裡的爾虞我詐與同床異夢之間作出對應與比較。但他的研究只從清朝對各國的態度來推論，並未著墨朝貢圈內的會面與互動帶來的影響。本文發現這些使節間唱和不但反映了東亞世界的接觸如何塑造朝、越之間的互動方式與框架，過程裡看見彼此都是對方的傳播者與接受者，也是彼此之間藉以形塑普拉特所說的「自我民族誌」。普拉特的專書聚焦在被殖民者如何利用宗主國的話語建立「自我民族誌」，但東亞世界的脈絡可進一步演繹普拉特的「自我民族誌」觀念，中國朝貢體系作為「宗主國」的話語及文化，成為朝鮮與安南接觸與交往的「文本文化」。當朝鮮與安南彼此間在此文化脈絡下，進行文化交流與競賽時，他們卻在各自的脈絡裡，都通過與對方較量，形塑呈現自我的話語，或可說是最終利用對方成為自我認定的勝利者。

（責任校對：廖安婷）

¹⁴⁶ 葛兆光，〈朝貢圈最後的盛會——從中國史、亞洲史和世界史看 1790 年乾隆皇帝八十壽辰慶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6（上海：2019），頁 21-3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朴趾源 Pak Chi-wŏn, 《燕巖集》*Yanyan ji*,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編, 《韓國文集叢刊》*Hanguo wenji congkan* 第 252 冊, 首爾 Seoul: 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2000。
- 朴齊家 Pak Che-ga, 《貞蕤集》*Zhenrui ji*, 首爾 Seoul: 國史編纂委員會 Kuksa pyeonchan wiweonhoe, 1961。
- 杜 佑 Du You, 《通典》*Tongdi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8。
- 阮 隄 Nguyễn Đè, 《華程消遣集》*Huacheng xiaoqian ji*, 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Fudan daxue wenshi yanjiuyuan、漢喃研究院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合編, 《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Yuenan Hanwen yanxing wenxian jicheng (Yuenan suo cang bian)* 第 8 冊,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10。
- 阮 儼 Nguyễn Nghiễm 等編纂, 《驩州宜仙阮家世譜》*Huanzhou Yixian Ruanjia shipu*, 漢喃研究院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藏, 編號: Vhn.1852。
- 阮朝國史館 Nguyễn triều Quốc sử quán 編纂, 《大南正編列傳初集》*Danan zhengbian liezhuan chujì*,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劃 Dự án số hoá kho tàng thư tịch Hán Nôm 藏, 編號: NLVNPF-0137-08。
- 吳士連 Ngô Sĩ Liên 纂, 陳荊和 Chen Chingho 編校, 《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Jiaohuben Dayue shiji quanshu*, 東京 Tokyo: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Toukyou daigaku Touyou bunka kenkyuuzyo, 1986。
- 李商鳳 Yi Sang-bong, 《北轅錄》*Beiyuan lu*, 收入林基中 Im Ki-jung 編, 《燕行錄叢刊增補版》*Yanxinglu congkan zengbuban*, KRPIA 資料庫, <https://www.krpia.co.kr/viewer/open?highlight=%e5%8c%97%e8%bd%85%e9%8c%84&plctId=PLCT00006852&nodeId=NODE06822122>。
- 李晬光 Yi Su-gwang, 《芝峯集》*Zhifeng ji*,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編, 《韓國文集叢刊》*Hanguo wenji congkan* 第 66 冊, 首爾 Seoul: 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1988。
- 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 《晉書》*Ji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4。

- 林基中 Im Ki-jung 編，《燕行錄全集》*Yanxinglu quanji*，首爾 Seoul：東國大學校出版部 Tongguk taehakkyo chulpanbu，2001。
- _____，〈《燕行錄續集》*Yanxinglu xuji*〉，首爾 Seoul：尚書院 Sangseoweon，2008。
- 金景善 Kim Kyōng-sŏn，〈《燕轅直指》*Yanyuan zhizhi*〉，收入林基中 Im Ki-jung 編，《燕行錄全集》*Yanxinglu quanji* 第 70 冊，首爾 Seoul：東國大學校出版部 Tongguk taehakkyo chulpanbu，2001。
- 洪大容 Hong Tae-yong，〈《湛軒書》*Zhanxuan shu*〉，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編，《韓國文集叢刊》*Hanguo wenji congkan* 第 248 冊，首爾 Seoul：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2000。
- 柳得恭 Yu Tūk-kong，〈《冷齋集》*Lingzhai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編，《韓國文集叢刊》*Hanguo wenji congkan* 第 260 冊，首爾 Seoul：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2000。
- 徐浩修 Sō Ho-su，〈《燕行記》*Yanxingji*〉，收入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 Seonggyungwan taehakkyo taedong munhwa yeonguweon 編，《燕行錄選集》*Yanxinglu xuanji* 上冊，首爾 Seoul：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 Seonggyungwan taehakkyo taedong munhwa yeonguweon，1962。
- 魚叔權 Ō Suk-kwŏn，〈《稗官雜記》*Baiguan za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 編，《國譯大東野乘》*Guo yi Dadong yesheng*，首爾 Seoul：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jok munhwa chujinhoe，1971。
- 張登桂 Trương Đăng Qué 等修，〈《大南寔錄》*Danan shilu* 第 4 冊〉，東京 Tokyo：慶應義塾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 Keiou gizyuku daigaku gengo bunka kenkyuuzyo，1962。
- 勒德洪 Ledehong 等修，〈《大清會典（康熙朝）》*Daqing huidian (Kangxi chao)*〉，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92-1993，清康熙年間刻本 Qing Kangxi nian jian keben。
- 國史編纂委員會 Kuksa pyeonchan wiweonhoe 編，〈《中宗實錄》*Zhongzong shilu*〉，〈《朝鮮王朝實錄》*Chaoxian wangchao shilu* 第 18 冊〉，首爾 Seoul：國史編纂委員會 Kuksa pyeonchan wiweonhoe，1968。
- _____，〈《正祖實錄》*Zhengzu shulu*〉，〈《朝鮮王朝實錄》*Chaoxian wangchao shilu* 第 46 冊〉，首爾 Seoul：國史編纂委員會 Kuksa pyeonchan wiweonhoe，1968。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Fudan daxue wenshi yanjiuyuan、漢喃研究院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Yuenan Hanwen yanxing wenxian jicheng (Yuenan suo cang bian)*〉，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0。

- 慶 桂 Qinggui 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Gaozong Chun huangdi shilu*，《清實錄》*Qing shilu* 第 10、26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鄭昌順 Chǒng Ch'ang-sun 等纂，《同文彙考》*Tongwen huikao* 第 2、4 冊，首爾 Seoul：國史編纂委員會 Kuksa pyeonchan wiweonhoe，1978。
- 黎貴惇 Lê Quý Đôn，《群書攷辨》*Qun shu kaobian*，河內國家大學圖書館藏昇龍敬意堂影印刻本 Thư viện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cang Shenglong Jingyitang yingyin keben。
- _____，《北使通錄》*Beishi tonglu*，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Fudan daxue wenshi yanjiuyuan、漢喃研究院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合編，《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越南所藏編）》*Yuenan Hanwen yanxing wenxian jicheng (Yuenan suo cang bian)* 第 4 冊，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2010。

二、近人論著

- 子安宜邦 Koyasu Nobukuni 著，童長義 Tung Chang-yi 譯，〈「東亞」概念與儒學〉“Dongya' gainian yu Ruxue”，收入高明士 Kao Ming-shih 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Dongya wenhuaquan de xingcheng yu fazhan: Rujia sixiang pian*，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05，頁 35-54。
- 夫馬進 Fuma Susumu 著，伍躍 Wu Yue 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Chaoxian yanxingshi yu Chaoxian tongxinshi: shijie shiye zhong de Zhongguo, Ribe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0。
- 王晨光 Wang Chenguang，〈朝貢與創作——越南使節燕行詩文研究意涵探析〉“Chaogong yu chuanguo: Yuenan shijie yanxing shiwen yanjiu yihan tanxi”，收入 Robin Visser、樂鋼 Yue Gang 主編，《東亞人文·2014 年卷》*Dongya renwen, 2014 nian juan*，臺北 Taipei：獨立作家 Duli zuojia，2014，頁 255-268。
- 朴現圭 Pak Hyun-kyu，〈《皇越詩選》所載越南與朝鮮使臣酬唱詩〉“*Huangyue shixuan suo zai Yuenan yu Chaoxian shichen chouchang shi*”，《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ji yanjiu jikan*，1，南京 Nanjing：2005，頁 292-306。
- 李宜樺 Li Yi-hua，《清代越南燕行使節的北京書寫研究》*Qingdai Yuenan yanxing shijie de Beijing shuxie yanjiu*，臺南 Tainan：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chengong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boshi lunwen，2017。
- 沈玉慧 Shen Yu-hui，〈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Qianlong ershiwu-ershiliu nian Chaoxian shijie yu Annan, Nanzhang, Liuqiu san guo renyuan yu Beijing zhi jiaoliu”，《臺大歷史學報》*Taida*

- lishi xuebao*, 50, 臺北 Taipei: 2012, 頁 109-153。doi: 10.6253/ntuhistory.2012.50.03
- _____, 〈近世東亞海域之使節交流與情報網絡——以朝鮮對暹羅、南掌、緬甸、蘇祿等國之情報蒐集活動為例〉“Jinshi Dongya haiyu zhi shijie jiaoliu yu qingbao wangluo: yi Chaoxian dui Xianluo, Nanzhang, Miandian, Sulu deng guo zhi qingbao souji huodong wei li”,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 26.1, 臺北 Taipei: 2016, 頁 27-59。
- 阮黃燕 Nguyen Hoang-yen, 《1849-1877 年間越南燕行錄之研究》*1849-1877 nian jian Yuenan yanxinglu zhi yanjiu*, 臺南 Tainan: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chenggong daxue Zhongguo wenxue xi boshi lunwen, 2015。doi: 10.6844/NCKU.2015.00768
- _____, 〈國內外未出版的越南燕行錄資料及其研究價值〉“Guoneiwai wei chuban de Yuenan yanxinglu ziliao ji qi yanjiu jiazhi”,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ji yanjiu jikan*, 13, 南京 Nanjing: 2016, 頁 253-267。
- 林侑毅 Lin Yu-yi, 〈由《同文彙考》論朝鮮後期使臣對周邊國家的認識——以對臺灣鄭氏政權及安南西山阮朝的論述為中心〉“You Tongwen huikao lun Chaoxian houqi shichen dui zhoubian guojia de renshi: yi dui Taiwan Zhengshi zhengquan ji Annan Xishan Ruanchao de lunshu wei zhongxin”, 《Journal of Korean Culture》, 35, 首爾 Seoul: 2016, 頁 343-371。
- 范永聰 Fan Wing Chung, 《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Shida yu baoguo: Yuan Ming zhiji de Zhong Han guanxi*, 香港 Hong Kong: 教育圖書 Jiaoyu tushu, 2009。
- _____, 〈檀君與箕子書寫文化溯源——兼談其歷史應用問題〉“Tanjun yu Jizi shuxie wenhua suyuan: jian tan qi lishi yingyong wenti”, 《東亞文化》*Tong'a munhwa*, 55, 首爾 Seoul: 2017, 頁 201-240。
- 孫宏年 Sun Hongnian, 《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研究》*Qingdai Zhong Yue zongfan guanxi yanjiu*, 哈爾濱 Harbin: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2006。
- 孫衛國 Sun Weiguo, 〈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Lun shida zhuyi yu Chaoxian wangchao dui Ming guanxi”,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Nankai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 天津 Tianjin: 2002, 頁 66-72。
- _____,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 (1637-1800)》*Daming qihao yu xiao Zhonghua yishi: Chaoxian wangchao zun Zhou si Ming wenti yanjiu (1637-1800)*,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07。

- _____，〈《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Cong “zun Ming” dao “feng Qing”：Chaoxian wangchao dui Qing yishi de shanbian, 1627-1910*，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2019。doi: 10.978.986350/3422
- 陳文 Chen Wen，〈《越南科舉制度研究》*Yuenan keju zhidu yanji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5。
- 陳益源 Chen Yi-yuan，〈清代越南使節於中國廣東的文學活動——兼為《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進行補充〉“Qingdai Yuenan shijie yu Zhongguo Guangdong de wenxue huodong: jian wei Yuenan Hanwen yanxing wenxian jicheng jinxing buchong”，《嶺南學報》*Lingnan xuebao*，6，香港 Hong Kong：2016，頁 247-275。
- 陳益源 Chen Yi-yuan、凌欣欣 Ling Hsin-hsin，〈清同治年間越南使節的黃鶴樓詩文〉“Qing Tongzhi nian jian Yuenan shijie de Huanghelou shiwen”，《長江學術》*Changjiang xueshu*，4，武漢 Wuhan：2011，頁 144-157。
- 陳國保 Chen Guobao，〈越南使臣與清代中越宗藩秩序〉“Yuenan shichen yu Qingdai Zhong Yue zongfan zhixu”，《清史研究》*Qingshi yanjiu*，2，北京 Beijing：2012，頁 63-75。
- _____，〈越南使臣對晚清中國社會的觀察與評論〉“Yuenan shichen dui wan Qing Zhongguo shehui de guancha yu pinglun”，《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10，開封 Kaifeng：2013，頁 55-67。
- 陳慧宏 Chen Hui-hung，〈「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Wenhua xiangyu de fangfalun’: pingxi Zhong Ou wenhua jiaoliu yanjiu de xin shiye”，《臺大歷史學報》*Taida lishi xuebao*，40，臺北 Taipei：2007，頁 239-278。doi: 10.6253/ntuhistory.2007.40.07
- 張伯偉 Zhang Bowei，〈名稱·文獻·方法——《燕行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Mingcheng, wenxian, fangfa: Yanxinglu yanjiu zhong cunzai de wenti”，《南國學術》*Nanguo xueshu*，2，澳門 Macau：2015，頁 76-89。
- 張京華 Zhang Jinghua，〈三“夷”相會——以越南漢文燕行文獻為中心〉“San ‘yi’ xianghui: yi Yuenan Hanwen yanxing wenxian wei zhongxin”，《外國文學評論》*Waiguo wenxue pinglun*，1，北京 Beijing：2012，頁 4-44。
- 張明富 Zhang Mingfu，〈乾隆末安南國王阮光平入華朝覲假冒說考〉“Qianlong mo Annan guowang Ruan Guangping ru Hua chaojin jiamao shuo kao”，《歷史研究》*Lishi yanjiu*，3，北京 Beijing：2010，頁 60-67。
- 區顯鋒 Au Hin Fung，〈陳荊和對越南史研究之貢獻〉“Chen Jinghe dui Yuenanshi yanjiu zhi gongxian”，收入周佳榮 Chow Kai Wing、范永聰 Fan Wing Chung 編，

- 《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Dongya shijie: zhengzhi, junshi, wenhua*，香港 Hong Ko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4，頁 366-386。
- 陸小燕 Lu Xiaoyan，〈康熙十三年安南使者的中國觀感與應對——兼和朝鮮燕行文獻比較〉“Kangxi shisan nian Annan shizhe de Zhongguo guangan yu yingdui: jian he Chaoxian yanxing wenxian bijiao”，《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ji yanjiu jikan*，10，南京 Nanjing：2014，頁 241-260。
- 陸小燕 Lu Xiaoyan、葉少飛 Ye Shaofei，〈萬曆二十五年朝鮮安南使臣詩文問答析論〉“Wanli ershiwu nian Chaoxian Annan shichen shiwen wenda xilun”，《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ji yanjiu jikan*，9，南京 Nanjing：2014，頁 395-420。
-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Fudan daxue wenshi yanjiuyuan 編，《從周邊看中國》*Cong zhoubian kan Zhonggu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 _____，〈東亞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Dongya wenhua jian de bisai: Chaoxian fu Ri tongxinshi wenxian de yiy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9。
- 黃俊傑 Huang Chun-chieh，〈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Zuowei quyushi de Dongya wenhua jiaoliushi: wenti yishi yu yanjiu zhuti”，《臺大歷史學報》*Taida lishi xuebao*，43，臺北 Taipei：2009，頁 187-218。doi: 10.6253/ntuhistory.2009.43.05
- _____，〈東亞文化交流史中的「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現象及其研究方法論問題〉“Dongya wenhua jiaoliushi zhong de ‘qu mailuohua’ yu ‘zai mailuohua’ xianxiang ji qi yanjiu fangfalun wenti”，《東亞觀念史集刊》*Dongya guannianshi jikan*，2，臺北 Taipei：2012，頁 55-77。doi: 10.29425/JHIEA.201206_(2).0002
- 葉少飛 Ye Shaofei，〈安南莫朝范子儀之亂與中越關係〉“Annan Mochao Fan Ziyi zhi luan yu Zhong Yue guanxi”，《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Yuanshi ji minzu yu bianjiang yanjiu jikan*，31，南京 Nanjing：2016，頁 172-184。
- _____，〈越南古代「內帝外臣」政策與雙重國號的演變〉“Yuenan gudai ‘nei di wai chen’ zhengce yu shuangchong guohao de yanbian”，《形象史學研究》*Xingxiang shixue yanjiu*，1，北京 Beijing：2016，頁 134-166。
- 葛兆光 Ge Zhaoguang，〈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Chaogong, liyi yu yiguan: cong Qianlong wushiwu nian Annan guowang Rehe zhushou ji qing gaiyi fuse shuoqi”，《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Fud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2，上海 Shanghai：2012，頁 1-11。
- _____，〈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Wenhua jian de bisai: Chaoxian fu Ri tongxinshi wenxian de yiyi”，《中華文化論叢》*Zhonghua wenhua luncong*，2，上海 Shanghai：2014，頁 1-62。

- _____，〈《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Xiangxiang yiyu: du Lichao Chaoxian Hanwen yanxing wenxian zha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4。
- _____，〈《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觀念的再澄清》*Lishi Zhongguo de nei yu wai: youguan "Zhongguo" yu "zhoubian" guannian de zai chengqing*〉，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2017。doi: 10.978.988237/0142
- _____，〈朝貢圈最後的盛會——從中國史、亞洲史和世界史看 1790 年乾隆皇帝八十壽辰慶典〉“Chaogongquan zuihou de shenghui: cong Zhongguoshi, Yazhoushi he shijieshi kan 1790 nian Qianlong huangdi bashi shouchen qingdian”，《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Fudan xuebao (shehui kexue ban)*，6，上海 Shanghai：2019，頁 21-31。
- 廖敏淑 Liao Min-shu，〈《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再版）*Qingdai Zhongguo duiwai guanxi xinlun (zaiban)*〉，臺北 Taipei：政大出版社 Zhengda chubanshe，2017。
- 漆永祥 Qi Yongxiang，〈「燕行錄學」芻議〉“Yanxinglu xue' chuyi”，《東疆學刊》*Dongjiang xuekan*，36.3，延邊 Yanbian：2019，頁 1-15。
- 劉玉珺 Liu Yujun，〈《越南漢喃古籍的文獻學研究》*Yuenan Hannan guji de wenxianxue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鄭永常 Cheng Wing-sheung，〈《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Zhengzhan yu qishou: Mingdai Zhong Yue guanxi yanjiu*〉，臺南 Tainan：國立成功大學出版組 Guoli chenggong daxue chubanzu，1998。
- _____，〈一次奇異的詩之外交：馮克寬與李暉光在北京的交會〉“Yi ci qiyi de shi zhi waijiao: Feng Kekuan yu Li Suiguang zai Beijing de jiaohui”，《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Taiwan gudian wenxue yanjiu jikan*，1，臺北 Taipei：2009，頁 345-372。
- 賴淙誠 Lai Chung-cheng，〈《清越關係研究——以貿易與邊務為探討中心 (1644-1885)》*Qing Yue guanxi yanjiu: yi maoyi yu bianwu wei tantao zhongxin (1644-1885)*〉，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lishi yanjiusuo boshi lunwen，2004。
- 羅樂然 Law Lok-yin，〈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Qingdai Chaoxianren xiyangguan de xingcheng: yi Hong Darong yanxing wei yanjiu zhongxin”，《東亞文明研究學刊》*Dongya wenming yanjiu xuekan*，10.1，臺北 Taipei：2013，頁 299-345。doi: 10.6163/tjeas.2013.10(1)299

- 夫馬進 Fuma Susumu, 《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 *Tyousen engyousi to Tyousen tuusinsi*, 名古屋 Nagoya: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Nagoya daigaku syuppankai, 2015。
- 吉川和希 Yoshikawa Kazuki, 〈十五世紀後半の中越間における使節往還: 一四七五年ベトナム使節の雲南到来とその背景〉“Juugo seiki kouhan no Tyuu Etu kan ni okeru sisetu oukan: 1475 nen Betonamu sisetu no Un’nan tourai to sono haikai”, 《東洋学報》 *Touyou gakuhou*, 97.4, 東京 Tokyo: 2016, 頁 59-93。
- 西嶋定生 Nishijima Sadao, 《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1》 *Higashi Azia sekai no keisei 1*, 《岩波講座世界歴史》 *Iwanami kouza sekai rekisi* 第4冊, 東京 Tokyo: 岩波書店 Iwanami syoten, 1969。
- 清水太郎 Shimizu Taro, 〈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の事例を中心に〉“Betonamu sisetu to Tyousen sisetu no Tyuugoku de no kaikou no zirei o tyuusin ni”, 《北東アジア文化研究》 *Hokutou Azia bunka kenkyuu*, 12, 鳥取 Tottori: 2000, 頁 15-31。
- _____, 〈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 (2)——1790 年の事例を中心に〉“Betonamu sisetu to Tyousen sisetu no Tyuugoku de no kaikou (2): 1790 nen no zirei o tyuusin ni”, 《北東アジア文化研究》 *Hokutou Azia bunka kenkyuu*, 14, 鳥取 Tottori: 2001, 頁 31-47。
- _____, 〈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 (3)——1597 年の事例を中心に〉“Betonamu sisetu to Tyousen sisetu no Tyuugoku de no kaikou (3): 1597 nen no zirei o tyuusin ni”, 《北東アジア文化研究》 *Hokutou Azia bunka kenkyuu*, 16, 鳥取 Tottori: 2002, 頁 35-54。
- _____, 〈朝鮮使節とヴェトナム使節の中国での邂逅: 虚構の交流〉“Tyousen sisetu to Vetonamu sisetu no Tyuugoku de no kaikou: kyokou no kouryuu”, 《전북사학》 (全北史學) *Cheonbuk sahak*, 31, 全州 Jeonju: 2007, 頁 113-138。
- _____, 〈北京におけるベトナム使節と朝鮮使節の交流——15 世紀から 18 世紀を中心に〉“Pekin ni okeru Betonamu sisetu to Tyousen sisetu no kouryuu: 15 seiki kara 18 seiki o tyuusin ni”, 《東南アジア研究》 *Tounan Azia kenkyuu*, 48.3, 京都 Kyoto: 2010, 頁 334-363。doi: 10.20495/tak.48.3_334
- 野平宗弘 Nohira Munehiro, 〈ベトナムの詩人、阮攸の 19 世紀初頭漢詩作品における屈原〉“Betonamu no sizin, Gen Yuu no 19 seiki syotou Kanshi sakuhin ni okeru Kutu Gen”, 《東京外国語大学日本研究教育年報》 *Toukyou gaikokugo daigaku Nihon kenkyuu kyouiku nenpou*, 19, 東京 Tokyo: 2015, 頁 175-190。

- _____, 〈阮攸の北使経路の再考〉“Gen Yuu no kitasi keiro no saikou”, 《総合文化研究》 *Sougou bunka kenkyuu*, 20, 東京 Tokyo: 2017, 頁 6-26。
- 金泰俊 Kim Tae-jun, 〈연행록의 교과서 『노가재연행일기』〉(燕行錄的教科書「老稼齋燕行日記」)“Yeonhaengnokeui Kyogwaseo ‘Nogajae yeonhaeng ilgi’”, 《국제한국학연구》(國際韓國學研究) *Kukche Hangukhak yeongu*, 1, 首爾 Seoul: 2003, 頁 93-115。
- 崔韶子 Choi So-ja, 〈「燕行錄」 연구를 위한 제안〉(「燕行錄」研究建議)“‘Yeonhaengnok’ yeongureul wihan che’eon”, 《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 *Myeongcheongsa yeongu*, 30, 首爾 Seoul: 2008, 頁 1-11。doi: 10.31329/jmhs.2008.30.001
- _____, 〈明清과 朝鮮, 朝鮮과 明清 關係史 연구현황과 과제—수교 20 주년에 즈음하여—〉(明清與朝鮮、朝鮮與明清關係史研究現況與課題—韓中建交 20 周年紀念—)“Myeongcheongwa Joseon, Joseongwa Myeongcheong gwanggyesa yeongu hyeonhwangwa gwaje: Sugyo isib junyeone jeueumhayeo”, 《명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 *Myeongcheongsa yeongu*, 38, 首爾 Seoul: 2012, 頁 1-57。doi: 10.31329/jmhs.2012..38.001
- Duncan, John.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Koryō and Early Chosōn,” *Korean Studies*, 18, 1994, pp. 76-102.
- Dutton, George E. *The Tây Sơn Uprising: Society and Rebell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Vietn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doi: 10.1515/9780824865078
- Kelley, Liam C. *Beyond the Bronze Pillars: Envoy Poetry and 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hip*.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 Ok Young Jung. *Early Printings in Korea*. Seongnam: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Press, 2013.
- Phạm Quang Ái (范光愛). “Hoan Nam sứ giả Nguyễn Đề xướng họa cùng sứ thần Triều Tiên,” *Tạp chí Nghiên cứu và Phát triển*, 140, 2017, pp. 67-82.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 Standaert, Nicolas. *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17th Century*. Hong Kong: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 Wang Yuancho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doi: 10.7591/9781501730511
- Wills, John E. Jr. “Functional, Not Fossilized: Qing Tribute Relations with Đại Việt (Vietnam) and Siam (Thailand), 1700-1820,” *T’oung Pao*, 98.4-5, 2012, pp. 439-478. doi: 10.1163/15685322-984500A5

**A Thousand Miles Between the Green Duck and the Red
Falcon: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Envoys of Annam and Chosŏ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Law Lok-yin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lylaw@hkmu.edu.hk

ABSTRACT

Cultural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can be identified in examples from Annam's mission to China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Sinitic literature, tributary rituals, and status in the East Asian world order were the critical components that different East Asian tributary representatives used to compare their nation's cultural standards with those of other states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various records of envoy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this article will pay attention to Nguyễn Đê's (1761-1805) poetry collection (*Hoa trình tiêu khiển tập* [Collections of Nguyễn Đê's trip to China]) from 1795. Nguyễn Đê was a critical envoy of the Tây Sơn dynasty, and his poems reveal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Annam and Chosŏn diplomats. While Nguyễn Đê affirmed the cultural status of the Tây Sơn dynasty through such cultural interaction, Chosŏn envoys responded to the Annam emissaries with passive ritual consider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competition and local cultural background acted as significant factors in shaping the formats used in the envoys' poems and writings. The exampl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nnam and Chosŏn, as well as Nguyễn Đê's poetry collection from 1795, reveal new perspectives for exploring how cultural competition was the critical factor in re-shaping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Annam-Chosŏn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 It was also the key indicator used to represent the tributary state itself.

Key words: Annam envoys, Chosŏn envoys, cultural competition, Tây Sơn dynasty, Nguyễn Đê

Dix mille *li* entre le Canard vert et le *Milvus vermeil* – Échanges et compétitions culturels entre les envoyés diplomatiques d’Annam et de Chosŏn à l’époque Ming-Qing

Cet article passe en revue le processus des missions d’Annam en Chine à l’époque Ming-Qing. Il examine ensuite les contacts entre les envoyés d’Annam et ceux de Chosŏn ainsi que leurs échanges et leurs compétitions culturels, à travers la littérature, les rituels et les titres. L’article se concentre sur le recueil de poésies, intitulé *Hoa trình tiêu khiển tập* (Collection du périple en Chine), de Nguyễn Đê’s (1761-1805) qui, en 1795, fut l’émissaire de la dynastie Tây Sơn. L’échange de chants entre Nguyễn Đê et les envoyés de Chosŏn ne constitue pas un simple jeu littéraire chinois, c’est aussi la reconnaissance du statut culturel de la dynastie Chosŏn et de la dynastie Tây Sơn. Par ailleurs, le respect de l’étiquette dans les négociations des agents de ces deux nations avait des considérations culturelles.

Cet article aidera la communauté scientifique à examiner comment le sentiment de concurrence culturelle a été un facteur de maintien de l’ordre en Asie de l’Est et un moyen d’auto représentation pour les États tributaires.

Mots clés : envoyés d’Annam, envoyés de Chosŏn, compétition culturelle, dynastie Tây Sơn, Nguyễn Đê

緑鴨朱鷺千萬里——明清時代 安南・朝鮮の朝貢使節間の文化交流と競争

本稿では、明清時代の安南朝貢使節の行程を確認し、安南使節と朝鮮使節が中国で如何に接触し、如何に文学や儀礼、地位などを通じて文化交流し、競い合ったかを探った。1795年の西山王朝による朝貢使を代表する阮愰（1761-1805）の燕行詩集『華程消遣集』に注目し、彼が朝鮮朝貢使と交わした詩を分析し、単純に漢文学の交流だけでなく、朝鮮の文化的地位を借りた西山王朝の文化水準の肯定であるとする。また朝鮮使節と安南使節の交渉の中で、礼節を失わないイメージには、その文化的な配慮が見られる。

さらに東アジア使節の詩文の創作が、単なる感情の交流や相互評価ではなく、同時に各種文化的競争に関する隠れた意味が滲み出ており、このことが文化的競争の結果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も強調した。本研究は文化的競争意識が如何に東アジアの世界秩序維持の要因となり、朝貢国の自己表現の手段となったかを考察する。本研究が今後の明清研究の一助となると考える。

キーワード：安南燕行、朝鮮燕行、文化的競争意識、西山朝、阮侁

Millionen Meilen zwischen der Grünen Ente und dem Roten Falken: Interaktion und Wettbewerb der Kulturen zwischen den Gesandten von Annam und Chosŏn während der Ming-Qing-Zeit

Der Artikel diskutiert die kulturelle Interaktion und den Wettbewerb in Literatur, Etiquette und weiteren Kulturgütern zwischen den Gesandten von Annam und Chosŏn während der Ming-Qing-Zeit. Er konzentriert sich besonders auf die Gedichtsammlung von 1795 (*Hoa trình tiều khiển tập* [Sammlung von Nguyễn Đễ's Reise nach China]) des Gesandten der Tây Sơn Dynastie, Nguyễn Đễ (1761-1805), die den kulturellen Wettbewerb zwischen den Diplomaten aus Annam and Chosŏn und ihre Interaktion mit der höfischen Han Kultur belegt. Wir zeigen die Relevanz dieser Dichtung für Erkenntnisse zum Bewusstsein der respektiven kulturellen Hintergründe, aber auch zum kulturellen Wettbewerb dieser Länder untereinander auf. Die Analyse der Gesandtendichtung und ihrer Dichterwettbewerbe leistet einen maßgeblichen Beitrag zur Forschung zu den Annam-Chosŏn Beziehungen, sowie zu deren Position innerhalb Ostasiens. Zudem demonstriert die diskutierte Sammlung das Selbstverständnis tributärer Länder innerhalb des ostasiatischen Kulturraums.

Key words: Annam Gesandtschaft, Chosŏn Gesandtschaft, Kultureller Wettbewerb, Tây Sơn Dynastie, Nguyễn Đễ

(收稿日期：2020. 5. 7；修正稿日期：2021. 9. 8；通過刊登日期：2021. 10. 19)